

婦女、性別及其他： 近廿年中國大陸和香港的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及其發展前景

葉 漢 明*

摘 要

近年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婦女史研究者都強調本土探索的重要性，並對西方女性主義史學作出檢討。在婦女史的發展方興未艾之時，性別史的研究方案亦已提出。大陸在八〇年代後的民間研究令婦女運動史在黨史的傳統之外有了反思餘地，社會史的興起可說提供了一條從黨史到人民史的出路。在理論和方法學方面，近年最顯著的是對「社會性別」觀念的引入，但有關分析架構仍有待應用於實際研究。香港的研究則在文化史和社會史方面的成果較豐，在社會科學和性別研究的影響下，已較早地注意到科際整合、理論探索和性別視野的重要性。中西文化交接的語境，也造就了當地中外學者對女性主義、現代／後現代性、後殖民理論等的研判。有關發展能否帶來突破，還得拭目以待。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今天兩地的婦女史家均提倡婦女史與性別史並進，並指出中國和華人女性主體的多元建構性、流動性和複雜性，以及性別與階級、種族或其他社會關係間互動的可能。可預見的是，社會性別的概念將刺激大陸學者對中國民族主義和現代性的反思，後殖民理論則可繼續用以分析香港的殖民主義現代性與中國傳統父權文化間的互動。我們還得「賦性別關係以歷史性」，來檢驗宏觀理論的適切性，並對歷史有更全面的認識。這正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對世界史壇和性別學範式的啓示。

關鍵詞：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國大陸、香港、性別史、階級/種族
/其他

一、前 言

近年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中國婦女史研究者都強調本土探索的重要性，並在重視中外學界的交流和對話的同時，對西方女性主義史學作出檢討。在婦女史的發展方興未艾之時，性別史的研究方案亦已受到關注。兩地的婦女史家均提倡婦女史與性別史並進，並指出女性主體的多元建構性、流動性和複雜性，以及性別與階級、種族或其他社會關係間互動的可能（杜芳琴，2002；葉漢明，1999）。這些反思將有利於植根本土的史學概念的建構和更新，以及跨文化、地域、族群及社會階層的婦女／性別史比較研究。婦女／性別史作為一個史學新領域，將以其對新知的開放和容納，滋養自身和其他史學範疇，並向固有的主流研究範式提出挑戰。

中國大陸和香港學術界及史學界在近年的變化，實與兩地的政治和社會經濟變遷息息相關。例如，八〇年代婦女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再現，是「改革開放」下的變化導致婦女問題浮現而引起關注的結果。除政府的婦女組織外，民間知識婦女也以前所未有的主動性，成為率先以研究方式回應有關問題的主力。1985年在河南成立的「婦女學會」，凝聚了

第一批以研究推動變革的學界女性力量，發起人李小江把這種努力稱為「婦女研究運動」(李小江, 1997)。另一方面，後毛澤東時代的來臨也令社會有較大的空間，以往把婦女運動史作為黨史一部分來研究的局限也得以打破，婦女社會史、生活史等領域遂有所開拓。婦女研究在這種新學風的影響下創出了 1949 年以來的第一個高潮 (李小江, 1995; S. Rosen, 1987; C. Gilmartin, 1984)。《婦女研究叢書》、《婦女理論叢書》及《女性研究叢書》等紛紛出版，內容包括婦女史學、婦女問題的社會學研究，以至從民族、傳統文化或心態等方面對性別問題所作的探討。在婦女研究熱潮的刺激下，近二十年中國大陸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有大量成果。其中論文過千，專著和教材上百，反映了新時期的研究盛況。

在香港方面，自上世紀七〇年代末以來，香港社會運動逐漸發展。為提高婦女的自覺意識和社會地位，婦女問題已成了嚴肅的研究課題。香港社會經濟在七、八〇年代飛躍成長，就業、教育、健康、福利、交通、犯罪、政治等成了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內容。性別作為一個社會分析範疇也日受關注。同時，學術界和非政府團體引入女性主義理論，激發了批判性辯論和行動。為推動性別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的性別角色研究計劃在 1985 年成立，是本地首個性別研究學術團體。二十年來，專上教育機構在開展婦女研究上各盡其力。發現和再發現本地婦女身分認同和意識的獨特性，是上世紀末香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點。近二十年由殖民地後期進入後殖民地時期的歷史經驗，刺激了社會問題的政治化，對身分認同的反思也加速了本土化的過程。婦女和性別研究者就趁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一方面重新檢視婦女在本地社會政治運動中的角色，另一方面著手梳理中國婦女史與香港婦女史間的微妙關係。香港邁進後殖民地時代的歷史契機，也造就了後殖民理論對婦女史學的介入。這些非殖民化的解構工作對本土探索的裨助，仍有待評估。

二、中國大陸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一) 黨史傳統與婦女運動史

如果說婦女運動是一個隨著 20 世紀八、九〇年代香港社會政治化和本土化而興起的新研究領域，這個課題卻已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期內，幾乎壟斷了中國大陸的婦女史研究領域，有關論述的官方色彩極濃，婦女運動史成了黨史的一環。改革開放後才稍有變化，部分論著中已開始容納個人見解。例如，在李小江主持下出版的《婦女研究叢書》，就包括呂美頤、鄭永福合著的《近代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一書（呂美頤、鄭永福，1990），內容雖未能涵蓋二〇年代以後的發展詳情，卻在分期上以共產黨的成立為婦女運動新紀元的開始。不過，該書已能點出中國缺乏獨立性婦女解放運動所帶來的後果。相較於其他婦女運動史著作，是書起碼意識到自主性對婦女運動的意義所在，頗能顯出「婦女研究運動」的民間影響力。¹

1. 近代初期的女權運動

(1) 婦女解放思想

通史外其他有關婦女運動和婦女解放思想的專題研究也間有新論。繼呂美頤、鄭永福提出「中國近代史上……也缺少獨立於男性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說法後，有學者再申論中國近代婦女運動的「男性特色」，指出「同西方女權運動相比，這是一場具有鮮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婦女運動，而不是婦女解放運動」，並認為這種運動所能給予婦女的權力很有限，「由於思想家把解放婦女視為政治鬥爭的需要，一旦他們認為目的已經達到，就開始重彈封建倫理的老調」（孫蘭英，1996）。與台灣和

1 比較近二十年出版的其他婦女運動通史著作，如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青長蓉等，《中國婦女運動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許榮主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馬庚存，《中國近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

國外一些看法近似，有大陸學者認為男性所以成為中國女權運動的最早發起人，乃因他們也身受父權家長制所害，故同情女性，並率先以女權運動反抗專制主義（桑兵，1996）。是以男性主導的女權運動有一定的工具性，其影響尚待深究。婦女運動的「男性特色」論，以及對男性文人、改良派或革命家的婦女觀等研究（夏曉虹，1995；靜雲，1987），實已涉及性別史的範疇。

對於西方的影響，近年大陸學界尤其開放。例如，不少學者肯定傳教士鼓吹男女平等思想的貢獻，多部婦女運動通史著作也指出這點（呂美頤、鄭永福，1990；青長蓉等，1989；劉巨才，1989：前言）。有關論述多集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與婦女解放思潮出現的關係上，有學者強調戊戌維新為中國近代初期婦女運動的關鍵期，² 研究晚清史的專家如夏曉虹則認為晚清的婦女觀念，已開始出現與傳統背離的傾向。討論世紀之交至五四運動的發展者，則已觸及婦女解放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一方面，有研究者專注於婦女解放思想的本土根源，指出其基礎在於傳統文化中反綱常名教的非正統思想。另一方面，有論者認為五四時期的婦女觀主要是西方文化的產物。亦有人建議把中國婦女運動視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結果（汪丹，1999；王美秀，1995）。西方個性解放的呼聲雖曾極具感召力，但社會革命觀很快便後來居上（何黎萍，1997；孟新安，1994；夏曉虹，1995、2004；焦潤明，1995；徐輝琪，1994；郭秀文，1999；張曉麗，1996；郭金梅，1999；梁景和，1996、1998、2000；王如青，2000）。專注探討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者，更進一步把中國婦女解放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提到研究議程上，認為中國共產黨有效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和中國婦女運動，是「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建構者（石巧蘭、李興芝，1992；劉巨才，1992；李靜之，1992）。然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本土性的追求之間，顯然存在一定的張力，有待梳理。

2 在戊戌婦女運動的局限性和開創性方面，見韓廉，〈對戊戌婦女運動局限的歷史審視〉，《婦女研究論叢》，期1（2001年），頁41-46；韓廉，〈戊戌婦女運動：中國批判性別本質主義的先驅〉，《婦女研究論叢》，期5（2003年），頁39-45。

(2) 運動的內容

除思想外，中國婦女運動的具體內容也顯示中西文化互動的影響。例如，清末的反纏足運動和興女學運動都有傳教士和教會的參與。從上世紀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的有關研究看，學者的視角更廣，論述更開放，且精於長時段的歷史考察。作品多肯定教會的貢獻和留學的影響（梁景時，1995；楊興梅，2000b；陳笑迎，2001；楊曉，1995；高得華、崔薇園，1995；梁景和，1993；吳洪成，1997；丁和平，1995）。可惜在近代女子教育與婦女運動關係方面研究成果不多，只有少數的研究者就女子教育對婦女覺醒的影響立論（宋瑞芝，1995；施宣圓，1997；何黎萍，2000）。同樣，研究早期的女子報刊的學者往往長於介紹和考證（姜緯堂、劉寧元，1990），而較少評價報刊的影響和對婦女運動的意義（周昭宜，1997；張曉麗，1996；張顯菊，1995）。在婦女組織的研究上，有學者介紹了20世紀初出現的女子團體，並指出它們對辛亥革命後女權運動的影響（張蓮波，1991）。

辛亥革命後女權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女子參政運動。在這方面，1986年台灣學者王家儉的力作〈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已成珠玉在前的研究範本（王家儉，1986）。到了九〇年代末，大陸學者再就民初女子參政的意義和影響作出評價。有學者甚至認為這場運動不僅開了中國近代婦女參政的先河，在世界婦運史上也應佔一席位（嚴昌洪，1998；張蓮波，1988；經盛鴻，1989、1995；周亞平，1993；戴東陽，1995）。五四時期的婦女史研究，過去集中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男性的婦女觀上。九〇年代後的新課題除思潮、論爭外，還包括運動的特點和影響，個案與比較等方面（扈光民，1990；陳信瓊，2002；李本義，1998）。以上各項與近代中國早期婦女運動有關的內容，在二〇年代後的情況，見下文對國共兩黨領導下的婦女運動所作的近二十年研究回顧。

2. 二〇年代以後的婦女運動

由於對黨史的重視，作為黨史一環的婦女運動史，一直是大陸史壇重視的領域。九〇年代出版的研究成果中，也包括國民黨統治區的婦女

問題，是為近年發展的新研究範疇。但中共領導下的婦女運動仍是最受關注的課題，學者繼續在建黨初期的婦女運動、大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革命根據地的婦女工作和抗日統一戰線等方面發表研究成果（楊引婷，1992a、1992b；葉孟魁，1997；董妙玲，1995；裘邁士，1989；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1988；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1985）。抗戰是民族主義高漲期，婦女抗戰史所重視的是婦女的愛國主義及在抗戰時期的活動和作用（周亞平，1995；王玲玲，1999；梁怡，1999）。較詳盡的著作則述及中共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比較（丁衛平，1999、2000）。此外，國共合作期間以及中共領導下的婦女組織和婦女參政運動等，也是學者繼續探討的專題。在參政運動方面，學者對二〇年代的情況已有較深入的討論，並已能就婦女參政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反響及爭論，考察其意義。連人們一向不大注意的國共合作後的婦女參政和1924年的女界國民會議運動，也受到初步的注意（吳淑珍，1990；張蓮波、周麗亞，1998）。當然，共產黨領導的婦女參政運動，以及各根據地的婦女組織仍最受研究者重視（周亞平，1992），但國統區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對統一戰線的態度，已開始受到一些學者關注。有關討論包括國統區內的婦女組織和活動（劉靜，1985）、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的性質變化（武錦蓮，1989）、抗敵後援會、各地戰地服務團等婦女抗日團體的成立、活動及社會影響等（羅義俊，1987）。

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婦女運動方面，近年的討論已有所增加。例如，有學者撰文討論南京國民政府禁纏足的措施，對五四運動以後反纏足運動的研究空白作了初步的填補，並提出新看法，認為「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女性纏足現象遠比過去所認知的更廣泛」。作者發現南京國民政府對不纏足運動的推動非常積極，「說它是近代不纏足運動的高潮階段，或不為過」。是「清季以來推行範圍最廣的一次不纏足運動」。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南京政府對此項政策的實施，至少在方式及方法上，「常常違反了民間的社會風習」，因此，相當數量的老百姓「把禁止纏足視為一項主要苛政」（楊興梅，1998）。也有學者從身體及其控制的問題切入，分析反纏足話語。有關討論已觸及一個向為人所忽略的問題：對

纏足的婦女而言，放足的痛苦絕不比纏足輕。此問題也帶出另一個鮮為人（包括以解放婦女為使命的男性）關心的問題：究竟被解放的婦女是否覺得自己真的解放了？（楊念群，2004；吳強，1995；梁景時，1995）。有關問題涉及「誰的現代性？」或現代性的性別觀等課題，值得進一步開拓和深入探討。

其他關於國民黨統治區婦女運動的討論，多集中在抗戰時期，例如，宋美齡主持的廬山談話會與統一戰線的形成，宋氏姊妹的角色，婦女指導委員會領導的「婦女訓練」，以及鄧穎超領導下的國民黨統治區婦女統戰工作，和雷潔瓊受婦女指導委員會之邀展開婦女工作的情況（董妙玲，1995；李媛，1993；夏蓉，2004；侯德楚，1995；晁海燕，1997；林庭芳，1991；水世瑋，1992）。

總的來說，二〇年代以後的婦女運動史仍偏重中共領導下的活動，近年雖已開始注意國民黨統治區的情況，但對國民黨與婦女運動的關係，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的婦女工作，三、四〇年代國民黨統治區內其他黨派的婦女運動方針和組織，抗戰時期重慶各界婦女的憲政運動，國民黨與婦女國民參政會的關係等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足，有待補充。1949年中共建國後婦女運動的變化、國家女性主義的性質、毛澤東時代及其後的婦女工作政策等課題，尤少批判性力作。

（二）歷史人物評價與近代婦女人物

大陸史學界曾一度以歷史人物評價為歷史研究的一大重要領域，特重傑出政治人物，在婦女史方面，情況亦然。近二十年婦女人物研究仍集中在幾位女精英人物上。例如，在早期中國婦女運動史的分期上，太平天國是一個具爭議性的階段，有學者甚至質疑太平天國與婦女解放的關係（饒任坤，1990）。天國女英雄洪宣嬌（或楊宣嬌）也是一個具爭議性的人物。對她的研究多屬考證性質，但其中一篇論文頗能從性別史的角度發問，作者針對洪宣嬌模仿洪秀全搞「靈魂升天」，結果被楊秀清以天父下凡名義責打一事，提出洪的行為可能是一位女性向男性領導爭平等權；也許可視為洪宣嬌要沖破洪秀全、楊秀清和蕭朝貴給婦女所設

的戒律羅網而作的反抗行動（梁義群，1998）。這種可能性有待進一步求證，但有關設想頗具啓發性，可供我們從性別角度研究歷史人物時參考用。有這種思維向度的研究者不多，上文提及有學者以「男性特色」觀照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即爲一例，他復對秋瑾這種好扮男裝的女英雄作如是觀，頗爲新鮮（孫蘭英，1996）。只可惜在眾多婦女人物的研究中絕少能從性別角度作深入分析的。例如，研究向警予、何香凝、蔡暢、宋慶齡等傑出女性的學者，多集中討論她們的功蹟和貢獻而已（何鵠至，1987；劉華清，1997；李衛平，1985；尚明軒，1994；李永等，1993；蘇平，1990；徐葉麗，1993；蘇愛榮，1994；韓新路，2002）。也可以說，無論從呈現女性複雜主體性的婦女史視角，或解構兩性權力關係的性別史視角去重新審視這些女性人物，都有建立新論的可能。

（三）婦女社會史的興起

如果說八〇年代前的大陸婦女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性質濃厚的婦女運動史或重要人物傳記範疇，其後的變化則是社會史的興起。雖然，如前所述，婦女運動史似乎仍佔優勢，但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卻是中共建國以來最豐盛的。一方面，改革開放下社會變化引致婦女問題浮現，加上「婦女研究運動」以研究推動變革，刺激了婦女學的發展，婦女社會史也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八〇年代的大陸史學界也掀起了「新社會史」熱潮，社會史研討會自1986年始連續召開，《中國社會史叢書》等也陸續出版，有關婦女史的社會史論著有了發表的園地。1993年呂美頤和鄭永福合著《近代中國婦女生活》一書（呂美頤、鄭永福，1993），可說是首部採社會史架構的婦女史專著，令人耳目一新。呂美頤復於1996年出版《走出中世紀：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的變遷》一書（呂美頤，1996）。羅蘇文也於是年出版其力作《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內容繁富，分析入微，足爲婦女社會史範本（羅蘇文，1996）。呂美頤又於1999年出版〈論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對社會變遷的推動作用〉一文，使婦女運動史與社會史接軌，指出婦女運動對社會變遷及其在提高婦女地位方面的效應（呂美頤，1999）。這些著作的面世，改變了過去只重政治史或重要人物傳記

的傳統，更多地顧及社會與經濟生活的內容，頗具研究啓發性。

1. 婦女教育問題

婦女教育既與婦女解放和革命運動史有關，也是社會史的重要一環，涉及各級學校教育與女性人才的培育、知識女性的成長的關係等方面的討論（黃新憲，1992；閻廣芬，1996）。有學者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近代女子教育的興起和發展（汪秀美，2001）。一些論者討論總體發展的歷程，也有專論不同時空或個案的情況。例如，有文章談五四前後的變化（張海梅，2001；蔣美華、蔣英華，2001）、上海一地的發展（楊潔，2001）和個別學校的角色（胡衛青，2003）等。

早期女校的創辦、教會的角色和女留學生等是常見的研究對象。在八、九〇年代大量出版的有關教會女子教育的論文，大多肯定教會的貢獻。對女子留學的研究，也涉及中外文化交流、早期教會與女子留學等課題（閻廣芬，1996；崔運武，1988；李永春，1997；王奇生，1996；董春，2002；郭衛東，2001；孫石月，1995；周一川，1989；謝長法，1995；郭常英、蘇小環，1991）。也有女子教育史家專論中國近代女子教育變遷與西方女學傳入的關係（閻廣芬，2000）。

在教育觀念和思想上，學者指出女子教育興起對傳統的衝擊（夏曉虹，2003），教育觀的變化，以及婦女教育議題的發展從「賢妻良母主義」、「國民之母」、「女國民」到「男女平等」、「人的教育」等階段的意義（張蓮波，1995；林吉玲，2001；閻廣芬，1999）。有關論述中所顯示的性別權力關係仍待深入探討。

2. 婦女的職業與社會階層及群體

《近代中國婦女生活》和《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二書均以相當篇幅論及近代職業女性的有關問題，舉凡城鄉婦女的生產活動、從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生產到近代工廠女工的出現，都有述及。但婦女與工作的研究範疇，仍有待開拓。目前的專研課題包括中國婦女爭取職業平等權的鬥爭，不同時期的婦女就業情況，上海職業婦女，知識婦女群體的崛起，婦女職業角色沖突的歷史回顧等（何黎萍，1998a、2000、2002、2003；

呂美頤、鄭永福，2002；忻平，1990；黃新憲，1990；沈智，1994；臧建，1994)。對婦女職業團體和實業團體的研究不多。不同階層或群體的婦女在經濟生活、營生策略等方面的分析也很有限(張麗艷，2001；王子今，1998；蔡鴻生，1996；陳健雄，2000；黃育馥，1995；陸德陽、王乃寧，2004)。就以妓女為例，在八〇年代婦女學熱潮的刺激下，至今已有多本有關著述面世(如：武舟，1990)，但研究仍有待深化。一些文章或通論早期城市現代化與娼妓問題(張百慶，1999)，或對娼業作地域個案分析(忻平，1998；江沛，2003)，或從婦女解放角度看廢娼問題(林紅，1997；馬維綱，1993；楊潔曾、賀宛男，1988)，但有關課題的複雜性以及娼妓群體的特殊性，仍待深入探究。

近年學者著力較多的主要是侵華日軍慰安婦問題。有關研究成果以堅實證據論斷了中國是日本慰安婦制度最大的實施地，是慰安婦最多的日軍佔領地，指出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設立的慰安所，分佈在由黑龍江至海南島的廣大地區，慰安婦人數總計在二十萬以上。除總體研究外還有區域性的調查(蘇智良、陳麗菲，1998；王海華，1999；蘇智良等，1999、2000a、2000b、2005)。有關研究已關乎戰爭與婦女的課題，須對倖存者作口述歷史考察。目前只有李小江主持下的「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計劃觸及此類婦女與戰爭的專題(李小江，2003b)。

口述史的方法也宜應用於婦女的分層研究這類社會史課題，目前還有其他中外學者在訪問中國農村婦女，除對改革開放下的現狀作社會調查或人類學式考察外，³ 歷史學者也在紀錄年長女性的記憶，以對一直被忽略的廣大農村婦女生存狀況及其歷史根源作補白的工作。

產業大軍中的婦女尤應受到注意，目前已有學者開展女工工作史、歷史上的鄉村婦女職業結構、近代史上的「打工妹」等範疇的探討(佟新，2003；李年終，2002；池子華，2000；小田，2001)。現況的歷史根源、工運史及其外的社會經濟史考察、女工聲音的追尋等，均屬尚待開發的領域。

3 如一直關注婦女與發展、改革與婦女等課題的高小賢等所進行的農村婦女訪查。參高小賢，〈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收入徐午等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4-17。

3. 婚姻及家庭制度

對婦女社會生活史的考察，肯定牽涉家庭及婚姻問題。按傳統習慣，婦女史可歸入家庭史和婚姻史，一般學者主要仍在制度和結構問題上鑽研，⁴ 討論清末民初婚姻及家庭變革的學者則指出，這場變革運動不僅是社會改良運動和民主運動的環節，更是女權運動（陳振江，1997；董江愛，1997）。此外，有學者就近代中國批判舊式婚俗的論述作分析；另有文章對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作進一步研究（徐建生，1997；徐永志，1999；劉小林，1999；蔣美華，1995；行龍，1991）。當然，變革運動最先主要在城市中進行。民國時期在這方面的社會學調查資料，可供進一步分析。有學者就按三〇年代金陵女子學院和天津、成都等地的統計數據，說明民國時期的城市婚姻變遷（陳蘊茜、葉青，1998）。近年新課題有離婚現象、甚至女匪首的婚姻家庭觀等（張偉，2000；邵雍，1999）。但直至最近，婦女家內勞動等在理論和實證上潛力無窮的研究領域，仍未受到足夠的關注。

近年出版的大量有關中國近代風俗變遷的論著中，涉及婚俗的不少。⁵ 對許多長期存在的舊俗，仍有學者只視之為陋俗，卻未能考究其長存的歷史因由（嚴昌洪，1991：220-228；李少兵，1994：238-245；張樹棟、李秀領，1990：239-242；呂美頤、鄭永福，1993：146-179；羅蘇文，1996：229-236）。婚俗變革的法律因素也是近年始受到注意的課題，

4 在婚姻史方面，參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陳鵬，《中國婚姻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0）；陶毅、明欣，《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汪玢玲，《中國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祝瑞開主編，《中國婚姻家庭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姜濤，〈中國近代婚姻與家庭結構〉，《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學報》，期4（1994年）。在家庭史方面，參邢鐵，〈二十世紀國內家庭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期4（2003年）。

5 如納妾制 [見姜躍濱，《中國妻妾》（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施永南，《納妾縱橫談》（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8）]，早婚制 [見傅建成，〈論民國時期華北農村的早婚現象〉，《社會學研究》，期4（1994年）；岳瓏，〈近代陝北女子早婚與生育健康〉，《人文雜誌》，期4（1999年）] 等；參梁景時，〈清末民初婚俗的演變述論〉，《山西師範大學學報》，期1（1999年）。

可惜專書仍不多，豐富的案例檔案資料有待發掘。目前有關討論包括民國時期國共兩黨的婚姻立法改革，但多非專題研究，只作為婚姻家庭史中部分內容而已（孫曉，1988：231-232；張樹棟、李秀領，1990：246）。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婚姻立法的進程和效果的研究仍欠深入，更遑論有關變革對婦女生活的具體影響。

4. 婦女與社會風俗及宗教信仰

某些社會陋俗，如溺女之風，不僅長期存在，且成為改革開放後在農村重現的社會問題之一。研究者已指出這個現象除關乎貧富差距的階級問題，也關乎重男輕女的性別問題（徐永志，1992）。歷史學者所重視的根源問題，應可對解釋這個當代農村社會現象有裨助，惜這方面的科際整合努力並不顯著。

有論者從文化角度談婦女禁忌（郭錦梓，1991），或從傳統習俗中看性別歧視（王慶淑，1995），也有認為婦女群體體現了陋俗文化者（梁景和，1999；梁景和、梁景時，1994）。但在社會史影響下，對纏足問題的研究已超越反纏足運動史的範疇（高洪興，1995；李鳳飛、暴鴻昌，1997；楊興梅，2000a），對不婚或獨身風習的探討，也己能兼顧漢族與其他民族間文化互相滲透的可能（王麗，2001；葉春生，2000；劉正剛、喬素玲，2001）。不過，不少關於少數民族婦女的研究仍未對漢族可能受到的影響有足夠關注（張曉，1997；杜芳琴、和鍾華，1998；定宜莊，1999a、1999b；和鍾華，2000；水鏡君、瑪利亞·雅紹克，2002；許周鶴，1996）。對方言族群婦女的研究也不多（李永集，1996）。

在研究婦女社會史時，史學界己能採納口述歷史的方法，但重視駐地考察和地方史料搜尋的歷史人類學進路仍未普及。例如在婦女與宗教的研究上，歷史學者多未能就現實社會上各宗教中，女性恆為人數最多的信眾和最熱心的參與者的現象，尋求歷史解釋，故對婦女的靈性生活和精神寄託、她們在有關儀式中的角色、在宗教群體中的活動等心態史題目，仍有待開發。一般史家只從歷史文獻考察女教徒的來源、分佈等問題。不少學者仍以女性信教為愚昧的迷信行為，忽視修持者的立場和

主體性。比較有成績的研究成果，是宗教與近代社會改良的關係這類功能主義性質的課題。例如佛教和基督教對社會的影響已有比較研究。來華女傳教士的工作，基督教女青年會在爭取女工福利方面的貢獻，及其對愛國救亡活動的參與等，都有頗為正面的評價（鄭永福，1994；鄭永福、呂美頤，1996；呂美頤，1994a；呂美頤、鄭永福，1990）。

其他與女性有關的社會生活和習俗，雖已納入史學的研究範圍，但仍待理論刺激所帶來的突破。例如清末民初女子服飾變革的專題，已引起多方面的興趣，對有關變化已有了系統的介紹，甚至地域比較的分析（金炳亮，1994；羅蘇文，1996：168；張敏，1999；李子雲、陳惠芬，2001；呂美頤，1994b）。但這種風習時尚變化所引起的社會輿論，則有待研究者從性別角度作出話語分析。有關課題還涉及女性身體與男性窺視、消費主義與父權資本主義現代性等新概念，須有相關的理論關懷來引發深化研究。

（四）「社會性別」觀念的引進和研究方案

總括而言，國內自八〇年代以來的變化，已令婦女史這個「非正統」的史學領域有了發展的空間。上文所提及的一些新論、新領域和新思維向度，是初步出現的鬆動所帶來的可喜現象，顯示了變化的可能和發展的潛力。民間研究令婦女運動史在黨史的傳統之外有了反思餘地，運動的自主和獨立性等課題也受到注意。社會史的興起可說提供了一條從黨史到人民史的出路，畢竟，「新社會史」的理想是從下而上看問題。從事平民婦女史的研究，就得採納口述史等方法來發掘新史料，婦女百姓再不能僅被視為待拯救者，歷史人物的研究，也不能再局限於拯救婦女百姓的女英雄豪傑。

近年對西方思潮價值的肯定，以及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婦女生活和國統區婦女活動的關注，也是一項新變化。這種發展其實也顯示出一種趨慕現代性的時代傾向。在理論和方法學方面，邇來最顯著的是對「社會性別」（gender）觀念的引入，上文提及的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男性特色」以及某些女性歷史人物的擬男嗜好，就有進一步作社會性別分析的

空間。張允熠的《陰陽聚裂論》和閔家胤主編的《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等書的出版，也可見社會性別觀自八〇年代以來，對社會科學以至史學的影響（張允熠，1988；閔家胤，1995）。不過，史學界尚未能對黨史、革命史等大歷史敘述，或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等概念，以至領袖人物作社會性別觀照下的系統性重評或反思，可見社會性別的思維向度雖受到重視，並已有人提出「賦歷史以性別意義」的呼籲，其在歷史研究上所能發揮的突破性影響暫仍有限。

難得的是，對「社會性別」的關注已不再限於社會科學界，畢竟，婦女研究的科際整合要求很強，從事婦女史研究的歷史學者，也很難避開有關挑戰。《史學理論研究》等期刊也得特為此邀稿作專題討論。⁶ 一方面，在婦女研究的領域上，李小江等先驅學者在進行婦女／性別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時也動員了史學界。有關努力從《歷史、史學與性別》等書的出版可見一斑（李小江等，2002）。不過，大陸史學界對「社會性別」的引進，近年出力最大者是杜芳琴和她的合作者。在中國大陸受大學教育後留學美國，現在美國任教的王政透過譯著、培訓、與國內外學者協作等方式發揮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她們自九〇年代以來的努力於今已見成效。她倆合編的《社會性別》、合著的《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杜芳琴、王政，2004）等書刊陸續面世，對觀念的引進、視界的擴闊、本土理論建構等方面的啟發，功不可沒。杜氏也和其他合作者編了《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杜芳琴、王向賢，2003）等書，並為其主持的研討班編讀本、資料冊及通訊等。⁷ 她所在的天津現已成了性別研究重鎮。她也是「婦女與社會性別學」書系編委會和「社會性別與歷史學」子課題編委會的成員。這些出版計劃凝聚了史學界中的婦女

6 見其〈婦女史與社會性別的啟示〉的專題討論，期3（2004年），特別是杜芳琴，〈婦女／社會性別史對史學的挑戰與貢獻〉；喬昭印，〈婦女史對歷史學的貢獻〉；劉文明，〈社會性別史：學理建構及其開放性〉；李銀河，〈關於性別史的思考〉和鄭永福、呂美頤，〈社會性別制度與史學研究〉等文。

7 如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編的《賦歷史以社會性別：Engende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及杜芳琴主編的《引入社會性別：史學發展新趨勢》等讀書研討班專輯，及杜芳琴、鄭新蓉、王金玲主編的《婦女與社會性別學通訊》。

史研究的力量，掀起了八〇年代社會史興起以來的另一個以社會性別為架構的婦女史理論和方法學議論高潮。

杜芳琴從事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個人經驗，剛好印證了近二十年中國大陸的婦女史發展歷程。她在八〇年代中從文獻入手研究中國「女性觀念的衍變」(杜芳琴, 1988), 九〇年代「發現婦女的歷史」(杜芳琴, 1995), 九〇年代末以後便開始引進「社會性別」的觀念和婦女及社會性別史的本土化研究, 並從事學科化的工作 (杜芳琴、蔡一平, 1999; 杜芳琴, 2002)。在引進理論和進行本土研究時, 她既強調開放的態度, 也更重視本土的關懷。她的開放可見諸以下她令傳統史學界為之側目的說法:

我們不再把書寫的歷史看成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 所謂純客觀、價值中立的歷史書寫是不存在的, 歷史是不斷被認識、被解構, 也同時不斷地被不同時代、不同的人群建構、複述的, 因此歷史包括婦女——性別的歷史應該是複數的, 同時也是複述的 (杜芳琴, 2002: 199)。

她的開放, 也可見諸其近年所介紹的各種重要性別概念。當中她特別重視 J. Scott 的「差異」概念, 並依此發展出她自己的一套「經、權、因、變」說 (杜芳琴, 2002: 197), 強調性別制度的因循延續與變化, 有其基本原則和模式, 但也有彈性和空間。她也借用 G. Bock 的婦女／性別史提法, 指出在進行性別史研究時, 也應時刻牢記把婦女作為關注重點。她復參考九〇年代末的「超越社會性別」命題, 提出「超越」就是將性別複雜化, 不以性別為唯一的分析範疇, 注意它和階級、種族等其他範疇的關係。依此, 她不斷重申婦女主體的多重性、矛盾性和複雜性。對她而言, 婦女性別史也是強調身分差異、多元和流動的歷史。

在本土的關懷方面, 杜氏主張在全球化的影響下, 性別文化的多元性和區域本土的價值更應受尊重, 故需要將婦女和性別關係作歷史語境化、情境化和具體化的處理。中國的婦女史家要善於觀察、理解中國社會性別制度的表現和運作。在這方面, 她提出一個多層次的研究方案: 一、「看制度規範」; 二、「看構築性別制度的有關主體分別對性別制

度建構做了些甚麼」？三、「看性別制度的實際運作與表現」（杜芳琴，2002：245）。如果性別觀念的引進是要「賦歷史以性別意義」的話，本土探索就要「賦性別以歷史意義」。這些反思內容無論對中國大陸的婦女史或總體歷史的研究，都是極富啓發性的。但這些概念如何應用於具體研究中，又能否帶來突破？還得看以後的發展。

(五) 小結：改革時代的研究願景

社會史的興起和「社會性別」觀的引入，都是中國大陸八〇年代後民間學術研究發展的結果。影響所及，一方面，婦女運動史在黨史的傳統以外有了反思的餘地，運動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等課題受到初步的注意。另一方面，社會史和生活史的出現，可說提供了一條從黨史和精英人物研究到人民史的出路。到了本世紀初，《20世紀的中國婦女》（王國敏等，2000）等婦女通史的內容，已涵蓋婦女運動、傑出人物、社會生活、生態以至現代化等，雖仍有為當前形勢服務的目的，論述範圍已有所開闊。不少婦聯成員也成了研究者（譚琳、劉伯紅，2005）。在社會史的領域內，除了職業和社會階層、婚姻和家庭、教育、宗教和習俗等研究範疇外，口述歷史對挖掘婦女主體性、讓無聲者發聲的作用也漸受重視。⁸ 但在婦女地位與法律、權力等的關係方面，研究仍很薄弱（徐勝萍，2000；王巖，1998；程郁，1999；何黎萍，1998b；張佩國，2002）。平民婦女尤其是廣大農村婦女的生存狀況，則仍待史學界探究其歷史根源。

雖然民族主義和婦女作為待拯救的對象的五四論述，仍繼續是不少婦女史著的基調，部份學者已開始注意早期婦女運動中的「男性特色」及其影響，在此性別史的角度呼之欲出。可喜的新近發展是對現代中國男性主體建構與女權話語發展的關係，以及男權社會中的新女性及男女交往等課題的開展（王政、陳雁，2005；侯杰、秦方，2003；侯杰，2005；

8 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項目就純屬民間學術活動，有關成果見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文化尋蹤》，《讓女人自己說話：民族敘事》，《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讓女人自己說話：獨立的歷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參楊祥銀，〈婦女史、口述歷史與女性主義視角〉，《浙江學刊》，期3（2004年），頁210-214。

姜海龍，2005；李德珠，2005；秦方，2005；程郁，2004)。王政等學者在引進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思維框架方面繼續發揮其影響力。⁹

中西文化互動的論述也衝擊著追尋純淨本土性的夢想。¹⁰ 畢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語與本土性的話語之間的張力仍待處理。另一方面，對現代性的趨慕也行將鬆動黨國的大敘述，但民國史的研究仍主要集中於國民黨治下的婦女和國統區內的有關情況，民國婦女的複雜主體性仍有待發掘，對其他黨派（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婦女運動方針和組織的討論也非常不足。顯然，近年民間學界對自由主義的研究尚待賦與性別意義，對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也付闕如。有待開展的還包括對民族主義、革命、改革以至黨史的性別分析，以及與境外學界在這方面的辯論。改革開放對婦女的長遠影響，仍需足夠的時間距離來作歷史評估。目前，在婦女／性別史的學科化、「社會性別」的理論和方法學建構方面的努力最顯著，但這些設想仍主要是分析架構多於具體研究，進一步的反思仍需實踐性的成果來引發。

三、香港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在具體研究上，香港的近代中國婦女史領域則包括社會史、文化史、運動史和性別史等。經歷了一個從中國史和香港史中尋找婦女，到對性別、階級和種族作後殖民反思的過程。

中國大陸和香港由於地理、政治、經濟等因素，一直維持著微妙的關係。即使在殖民地時代，香港在人口問題、與大陸的接壤、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方式等影響下，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一直是一個華人社會。它是中國大陸和海外文化、來自中國和各族群的移民、中西文化及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在這種文化的傳承與變遷、融合與分化的過程中，婦

9 王政近年在上海繼續推動有關研究活動，如中外學術交流、復旦—密歇根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的建立、「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國際研討會的召開、論文集的出版等。

10 部份台灣學者和社會行動家已索性捨「本土」而取「在地」一詞。

女作為文化載體、調適主體及交流和整合的媒體，其在香港及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實不容忽略。婦女在文化的流傳、溝通和整合，在家庭和社會生活、風土信仰、民間習俗、神話和宗教禮儀中的角色，及其在傳統與現代性的碰撞和互動中的處境，都是中國近代社會史和文化史中值得開展的研究項目。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對「小傳統」有興趣的文化人類學者進行田野調查的重鎮。B. Ward、J. Watson、R.S. Watson、E. Johnson、A. Sankar等都曾以香港為研究據點。此外，還有不少長駐香港的業餘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以及皇家亞州學會香港分會的成員等，對鄉禮俗風土懷有濃烈興趣。由於殖民地政府採用以華治華和不改變鄉村傳統的「不干預」政策，香港新界成為最能保存中國古老舊俗的少有華人地區之一，也成為專研中國小傳統的文化人類學者匯聚之地。他們的研究計劃雖非局限於婦女，卻搜集了許多有關婦女的史料，尤其在文化史方面的有關資料。在近代中國大陸與香港關係中婦女的角色，以及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和香港的迅速都市化的衝擊下，殖民地處境中的中國文化對婦女生活的影響等，都是引人入勝的課題。

香港的特性對本地歷史學界當然有一定的影響。本地學者研究中國歷史中的婦女，儘管能竭盡所能在正史中的婦女、文學中的婦女、傳統對婦女的態度等方面，建立嚴謹的學術範式，但在探討女性（尤其是一般婦女）的主體性方面卻困難重重。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學者一樣，香港學者面對的問題是有關婦女的歷史文獻不足，只有少量關於精英階層婦女的資料。香港就像中國一樣，宮庭婦女的故事是出版物中最流行的題材之一，而有關婚姻、家庭和風俗的文獻，也是婦女資料追尋者的搜集對象（劉詠聰，1994）。建立婦女研究獨立領域的工作才剛開始。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理論的突破是學者翹企以待的。

香港文化史的研究潛力首先觸發了本地學者對婦女文化史的理論關懷（葉漢明，1991）；也令他們注意到文化史與社會史的互動在方法學上的啓示（葉漢明，2000b）。中國近代社會史的興起，也引起了本地學者對中國婦女社會史的興趣，並從史學史的尋繹比較中西婦女社會史學的特

色，從而探索本土性理論建構的可能（葉漢明，1992、1995a）。此外，在政治史和人物研究的範疇內，專研中國古代婦女史的劉詠聰也參與了一項清代婦女傳記的國際性編撰計劃，成為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的合編者（L.X.H. Lee and A. D. Stefanowska，1998）。專研婦女文學的黃媽梨也編著了《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黃媽梨，1997），書中收錄了黃著的〈張若名與五四時期天津婦運〉、〈張若名年譜〉、〈張若名著作年表〉和〈張若名主要著作簡介〉等文。葉漢明對海峽兩岸婦女參政的反思文章，則包括了有關歷史背景的梳理（葉漢明，1999d）。不過，在文化史和社會史方面的研究，始終是本地學者的關注重點。

（一）婦女與文化史及社會史

1. 婦女與華南地方社會文化

香港作為華南的一部分，除了地理位置的意義外，在歷史上，兩地在文化、社會等方面都密切相關，這是史學界及文化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界的共識。一直從事中國地方史研究的葉漢明自九〇年代以來，即專注研究嶺南地方社會、華南民間宗教和地方傳統等（葉漢明，1999a、2000a）。對婦女文化與華南地方社會文化的關係尤為其興趣重心。有關研成果包括〈權力的次文化資源：自梳女與婢妹群體〉，〈華南家族文化與自梳風習〉、〈妥協與要求：華南特殊婚俗形成假說〉等（葉漢明，1995、1999c、1999b），顯示出一個從婦女文化史到婦女史與性別史並重的研究向度。一方面，從已發掘年長自梳女主體經驗的口述史的深入訪問報告中清楚可見，個體價值和群體文化是她們的力量之源。在個人層面上，「梳起」不嫁主要是女子自由、主動、自覺和有意識的選擇和決定，是婦女抗拒婚姻生活、追求某程度的個人獨立性的策略；在女性群體的層面上，她們也能以其同道姊妹間的彼此支援，建立組織力量。另一方面，她們也往往能利用家庭、宗族和社區對他們特殊生活方式和姊妹群組織的容忍，取得社會的支持（葉漢明，1995b；曹玄思，1994、1995；吳鳳儀，1996；M. Jaschok，1997：45；H.M. Yip，1996；A. Sankar，1985；

M. Topley, 1975)。其實，無論從實地調查或地方文化探源所得，我們都可清楚看到，華南的自梳女及姊妹群次文化，與宗族社會父權主文化間，有一種互動而相容的關係。這個吊詭現象使我們不能不把研究推向涉及兩性互動的性別史範疇。

實際上，自梳女從父系族權主文化及姊妹次文化兩方面吸取精神和力量，而如上所述，她們的次文化也並非完全與主文化相悖。這種主、次文化的妥協，也可說是婦女與其家族和地方社群互動的結果。這種妥協已將宗族制與自梳風俗整合於地方文化系統之中。是項研究進一步提出的假說是：華南漢族社區的不落家等婚俗，可能是儒家貞操觀與嶺南瑤、僮、黎等非漢族婚俗文化，以及婦女對自由的要求之間的一種妥協（葉漢明，1999b：283）。這裡所舉的是一個地方社會文化中，兩性互動關係的例子，其動態和多義的複雜性，足令任何靜態和單向的解釋系統失效。從本例子所示的自梳女姊妹群組織與宗族社會組織間的互動關係看來，我們在設想地方社會的構成和地方文化的塑造時，實在不能不同時考慮兩性的角色。

由於涉及兩性互動問題，這個本以口述史和實地考察法發掘平民女性聲音的婦女史計劃，終須兼採性別史的研究進路。一方面，透過女性文化和主體經驗的婦女史視角，我們可以注意到自梳女群體的自主能動性和自強策略；另一方面，自梳女次文化與父系族權主義文化的共存相容，以及兩者在華南地方文化中的整合現象，卻是性別史的有趣課題。婦女／性別史研究法的並用，使我們一方面能挑戰地方史上單一男性聲音，使看來與文化格格不入的邊緣婦女也能發聲，並顯其自主性。借用 P. Duara 的「分叉歷史」(bifurcated history) 的建議，我們要承認歷史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就應批判歷史的單一看法，讓那些被消聲的「失語」群體發聲，使他們的另類身分認同不再被掩蓋 (P. Duara, 1995：51-82)。不過，立足於本土研究的論斷也指出，西方的二元對立性別觀，無法解釋中國文化中重關係、互動和整合的性別主義。這種兩性的聯繫在上述的研究案例中已充分顯示出來。當然，這種互動關係絕非平等關係。否則，自梳女等婦女群體也不必苦心孤詣地爭取有限的自主空間。但以兩性對立

觀和永恆分叉論來說明這種吊詭現象，顯然過於簡化。這是中國本土婦女和性別研究成果對有關概念的挑戰。

2. 內地與香港間女性人口移動

就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關係方面，後者作為一個與珠江三角洲相依的地區，其在文化和社會經濟上的重要性值得注意。在這方面，兩地間的人口移動尤為重要研究課題。早期大陸婦女移入香港的歷史中，充斥著許多悲慘故事，其中一些是婦女被賣為娼妓、妾侍、僕婢的慘痛遭遇。悲劇的背景是中國（特別是華南地區）的連年災荒，導致貧困和犯罪活動的發生，其中不少案例涉及拐擄和販奴。

為了保護被擄拐、轉賣和被逼為婢為妓的婦女，香港保良局於1882年成立。該局保存了大批個案檔案，成為研究華南婦女被拐賣到香港，或經香港到東南亞的珍貴一手資料。日本學者可兒弘明最先使用這批資料，於1979年撰成《近代中國の苦力と「猪花」》，該書中文譯本於1990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孫國群、趙宗頗，1990）。但正如可兒所說，有關猪花的紀錄只佔保良局檔案一小部分，可開發的其他研究領域還很多。葉漢明在其文中就指出，利用這些資料，配合其他文獻或紀錄應還可寫出數本專著及多篇論文（葉漢明，1998）。

繼可兒之後引用保良局檔案的學者是洗玉儀，她在撰寫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一書時，採用了檔案中關於東華醫院的部分，但也留意到保良局本身在保護婦女和拯救被拐者方面的角色（E. Sinn, 1989）。洗氏另一篇論文就集中討論保良局的設立與香港保護婦女的慈善事業背後的中西權觀念，也涉及父權家長制與人身買賣制和家內僕役制的關係（E. Sinn, 1994）。葉漢明則注意到慈善活動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其〈慈善活動與殖民主義——香港早期的保良事業〉一文，審視保良局這個本地華人精英團體與殖民地政府間的微妙關係，所論涉及種族、階級及性別等方面，因香港早期的保良事業，實關乎殖民地政府統治下華人父權社會中的下層婦女的命運（葉漢明，2005）。

在買賣婦女的問題上，曾長駐香港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 M. Jaschok 於 1988 年著成 *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 一書，集中討論中國家庭把女孩買來當僕役的「妹仔」制度。這種制度盛行於中國和香港，富裕家庭中往往蓄養了大批妹仔，讓每個子女各有專責的婢女照料。大戶人家的女子出嫁時，也把近身的妹仔帶入夫家，這些「陪嫁妹」除繼續照顧女主人外，也供男主人家差使用，直至適婚年齡才由主人安排外嫁。她們之中也有人被男主人納為妾侍或賣為娼妓者。使人驚訝的是，香港政府在本世紀二、三〇年代試圖廢除蓄婢制，竟然困難重重。當時殖民地政府面對的主要阻力來自華人精英階層，他們認為蓄婢制帶有慈善性質，如無此制，不少年青婦女便會因家貧而淪落青樓。這個悖論，可兒弘明和 Jaschok 的書都有論及。前者的分析主要依靠文獻資料，後者則調查訪問了妹仔的後人，以生動的筆觸縷述了個案歷史，從而對妹仔制度、香港社會的婦女地位和反蓄婢運動所遇到的壓力作出評價。

另一香港史研究者 J. Hayes 在其“Women and Female Children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to 1949: Documents of Sale and Transfer” (1990) 一文中，進一步羅列了買賣和轉讓婦女的資料，其中包括了他私人珍藏的文獻，如賣女契，買妾婚約、許女為妾約、夫故賣女約、斷賣親女兒的契約、轉讓育女帖、轉讓生女帖、送女帖、送花女帖等，文件年代從清末到 1950 年代末期都有。這些資料多來自新界，記載了買賣、轉讓女性人口為養女、妾侍、妹仔的古舊傳統的留存。

此外，不少學者也重視女性移民與其故鄉間的聯繫，並追溯其來源地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以自由身來港的婦女包括許多不婚的「自梳女」，她們本多在珠江三角洲的縲絲廠工作，二〇年代末絲業衰落後，不少獨身的絲廠女工遷移到廣州、香港、澳門或東南亞城市中當女傭。她們的外移固然主要是為了謀生，但也有一些自梳女到外地工作並非出於經濟原因，而是為了見見世面 (A. Sankar, 1985: 60)。自梳風俗的起源問題仍未有定論，有一種現象卻是相當肯定的：自梳女制度即使移植到香港、新加坡等地，遠離原來促使其產生的文化背景，其基本結構依然存在。

在香港的自梳女傭體現了一種華南傳統和婦女文化在香港的延續。

3. 中國傳統下的家庭與親屬關係

中國的文化體系視家庭為社會核心，然而，已婚婦女傳統上都不被視為家庭的十足成員。以香港為主要研究基地的人類學家 R.S. Watson 透過對廈村的個案研究，發現婦女被摒於父系親族以外。她們不得進入祠堂，不得在公開正式的宗族儀式活動中出現。婦女有義務為家庭服務，未嫁時是為娘家，出嫁後是為夫家。而婚後住在男家的模式也加強了這一傳統，媳婦是屬於公公家庭的 (R.S. Watson, 1991a)。說到權利，婦女與其兄弟及丈夫完全不平等。她們不能繼承遺產，也無緣分得家族產業。她們處置嫁妝的法定權力也有所限制 (R.S. Watson, 1984、1985: 107, 126, 129, 135、1986、1991)。

儘管婦女在宗族中地位很低，她們往往能在姻親中建立某種關係網。姻親關係對婦女有特殊重要性，尤以出身低微者為然。地主／商人階層常利用姻親關係來維持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但農民階層中的男人則往往只活動於宗族圈子中，卻由婦女聯繫姻親。對這些婦女而言，姑嫂、妯娌等組成的女性親屬圈，為她們提供了安全感和認同的基礎。也正是這些女性親屬共同承擔了生、婚、喪活動中的實際工作。由於婦女處身在父系和夫系宗族之外，也由於男女間存在各種顧忌，難以發展友誼，女性姻親圈便成了婦女間建立情誼紐帶和活動網的主要領域。這種圈子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肯定是邊緣性的，但卻有一定的功能，也就對男女雙方都有利了 (R.S. Watson, 1981、1985: 133-136)。

R.S. Watson 復用廈村實地調查資料和香港政府有關妹仔問題的調查報告，作了有關香港地區僕役制與親屬的研究，發現華人家庭不但性別不平等，同一性別的家庭成員，也是等級森嚴。例如妻子、女兒一方與妾侍、僕婢一方，在家庭內的等級、及社會上的階層、身分、地位，都顯著不同。和男性相比，婦女全都算不上是正式的家庭成員；但與妾婢相比，正妻享有正統地位，妾婢的地位則屬依賴性和邊緣性 (R.S. Watson, 1991b: 247, 250)。性別與階級的關係於此可見。

4. 民間信仰和方言族群口傳文化

在父權制仍然殘存的農村，婦女要表達她們的痛苦，便要建立自己的次文化，並對民間傳說重加解說。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婦女大多是文盲，文學傳統和精英文化中對婦女的論述也很不足夠；因此民間文化和宗教及其地位與象徵意義，便有待深入研究，以了解基層婦女的心態和精神生活。例如，J. Watson 指出，有關天后神話的許多口頭版本都強烈暗示天后與自梳女和其他未婚婦女有特殊關係。新界有不少婦女深信天后為反抗父母要她嫁一個年紀大的男子而自殺；天后崇拜的一些版本也接受自殺為死亡的一種方式 (J. Watson, 1985: 297)。

正如天后崇拜在婦女和男人中有不同的版本，大眾表演藝術也向男女觀眾傳遞了不同的文化信息。B. Ward 對香港的地方戲曾作過長期研究，深入探討了這課題 (B. Ward, 1985)。但香港民俗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喪禮和婚禮的哭歌風俗，這些哭歌純由婦女唱出，因此體現了富有創造力的婦女文化，並代代相承流傳下來。

研究者留意到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鄉村中，老婦教少女唱哭歌的傳統。實地研究香港新界和華南農村的學者，也注意到未嫁姑娘到宗族提供的「女仔屋」消閒過夜的鄉村習俗。年青姊妹在女仔屋中除了講故事、慶祝七夕、拜祭民間女神等活動外，還會唱民謠和哭歌。婦女的歌唱傳統和民間傳說就這樣流傳下來。

此外，不少長駐香港的英國官員／學者，也根據他們長期對香港農村生活的研究，分析哭歌的內容，並把哭歌與山歌等體裁作比較。香港客家婦女尤以婚喪哭歌和山歌曲藝聞名。在哭喪歌方面，她們繼承並發展了廣東東部客家方言區婦女所唱的「叫哀子」(金帆，1949: 83-85)。E. Johnson 也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哭喪歌，分析這種客家婦女用以表達感情的方式及其社會文化意義。客家山歌中不少是以丈夫出洋工作為題材的，歌者當然是婦女，她們在丈夫出外工作時，便要負責種田，她們邊勞動邊唱山歌，工餘時也常唱歌自娛。研究蛋家社群的學者也指出，香港新界的屯門和離島大嶼山的大澳村一帶的蛋民，也有婦女唱喪的習俗 (蕭國鈞，1982: 87, 91, 注 5)。

5. 社會經濟轉型與文化變遷

中國的傳統不僅存於香港的鄉村社會中。事實上，文化的延續與變化，正弔詭地共存於今日香港生活的各個方面中，這正是多個研究範圍的學者間互相呼應的共同主題。葉漢明的“Wome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Hong Kong”一文的討論重點，便是婦女文化的價值，及婦女作為文化的傳承者和傳統的肩負者，在面對社會變遷時的調適，特別強調的是香港婦女作為能動的文化重塑者的角色 (H.M. Yip, 1997)。

究竟婦女大眾在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中的處境和經驗如何？她們的鮮活故事常是生命歷程史、生活史和口述史輯錄和記載的對象。曾從事婦女教育史研究的楊秀珠在其碩士論文中，以生命歷程史的方法，編寫了六位定居香港的廣東老婆婆的生平，環繞近代中國平民婦女教育主題，敘述她們的學習經驗、所接受的正規和非正規教育、謀生策略、處事方式、社交技巧等 (楊秀珠, 1989)。另一位教育學者蔡寶瓊，則以基層婦女的教育與工作的經歷為題，編成《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一書，生動描述了一群女工在七〇年代的生活體驗 (蔡寶瓊, 1998)。香港女工史仍是個尚待開拓的領域。

口述歷史對研究婦女史 (尤其是以平民婦女為歷史主體的社會史) 的價值日漸受到重視。一方面，歷史研究者對口述歷史的性質、採集和處理的方法以及口述史中的婦女主體性等問題作出反思 (葉漢明, 2002)；另一方面，婦女運動分子也以口述歷史來顛覆男人的「大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編寫的《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 1998)，載錄了十位年長女性的生平自述，涉及傳統文化和殖民主義下的女性身體、戰爭與性、婦女勞動和生計、逃難與社會動盪、資源匱乏、婚姻與女性自主、經濟起飛與婦女維生等豐富主題。該書初版後不斷再版，其受歡迎的程度是強調歷史普及性的公共史家所夢寐以求的。

無論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社會調查者，都有興趣考察社會經濟發展對傳統文化的衝擊，但香港在急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壓力下，保留古老風俗的鄉村區域正逐漸縮小，研究者的基地也愈來愈狹小了。對鄉村婦女生活的紀錄和研究也顯得逼切起來。例如，為興建新機楊，大嶼

山北部十數條村被拆除。為保存歷史紀錄而進行的口述訪查結果顯示，該區的農耕工作一直由婦女擔任，男子大部分出海謀生，可說是個女耕男航的社會，頗為奇特。在紀錄鄉村歷史的同時，採訪者也收錄了當地客家婦女的山歌。這項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的合作考察報告也特設性別一章，討論婦女工作與男女分工問題、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鄉村年長女性的生活等問題 (H.M. Yip and W.Y. Ho, 1996、2005; S.M. Tam and H.M. Yip, 2005)。

6. 中外婦女的互動

香港婦女外表上可能表現得很西化，但她們內心及潛意識中的傳統烙印和中國化程度，也許連她們都意想不到。畢竟，西化，甚至現代化，都往往隱含著強加的外來價值觀，接受的一方往往要調節適應。在這方面，婦女在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她們在殖民地社會的生活，中外婦女間的互動關係，都是亟待探討的題目。在這個尚待開拓的領域中，有關外僑婦女、歐亞混血婦女及她們與香港華籍婦女的聯繫等題目，本地研究者如 C.T. Smith 和 S. Hoe 等已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資料。

本身是牧師的 Smith 在他對教會與中國婦女的研究中強調，中國婦女在基督教社群中的地位改善了。教會社會運動的傳統早在香港傳教史的初期便已確立，有助於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在 1850 年前後，便有獨身婦女來港，作為先驅，在華人當中傳教，並在東方提倡女子教育。她們當中有香港第一位外籍婦女，她也是香港女子教育的先驅。這些女傳教士為女性樹立了妻子和母親以外的事業女性楷模 (C.T. Smith, 1985、1994)。

作家及業餘香港史研究者 Hoe 的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Expatriate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出版之前 (S. Hoe, 1991)，大多數外僑婦女，包括反蓄婢、反娼妓、反纏足等運動的活躍分子，都不見載於香港歷史。Hoe 在書中重建了這些婦女行動家的經驗性「逸史」，她們本來就不是消極地躲進「私人領域」的。

Smith 和 Hoe 等外僑作者的描述對象除香港外僑之外，還包括華人

甚至中國境內的外國人。例如，Hoe 的 *Chinese Footprints: Exploring Women's History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一書 (S. Hoe, 1996)，就以來往於港、澳和中國大陸間的中外婦女為主角，中國女性中有史良、蕭紅、宋慶齡等。這些敘述令女性的故事有了跨文化和跨地域的內容。

活躍在香港的女性外僑社會運動家當中，有曾參加過反纏足運動、取締妓院、妓女、鴉母牌照運動，以及反蓄婢運動的積極分子，她們的社會網絡中也包括中國同志。中西女性在香港早年的婦女運動中的合作和互動，是香港婦女史的一個重要課題。據Jaschok的研究，在香港反蓄婢運動和反納妾運動中的女外僑的論述中，這些熱心人士往往不自覺地以西方女性的經驗來看非西方婦女的解放，自以為代表所有女性，可以建構一套國際性的女性主義理論，並以之強加於非西方社會上，而不意識到這些理論也可能帶有霸權世界觀和先驗色彩。¹¹ 這類批判性的反思指出，為完成非殖民化和解構的工作，女性主義論述必須首先在平等的基礎上，承認其他有性別及文化特色的主體，以及在特有文化和社會脈絡中的婦女的聲音。

(二) 香港婦女運動

其實，正如Hoe所指出，即使香港早期的婦女運動以女性外僑為主，她們的中國同志也很快就成了運動中堅，例如反蓄婢運動最終成了香港華人的運動。這些本土婦運分子中有上層的女性精英、慈善家、宗教人士等。不管她們的立場是否受西方思想影響，我們仍得視這些華人婦女活動家為香港婦運的先驅，她們所經歷的是社會變遷和文化交流對中國傳統的挑戰。

在現代化和社會、經濟、政治變化的過程中，香港的婦運分子一代繼一代的向根深柢固（尤以農村為然）的家長制挑戰，也向家長制的保護者，奉行不干涉中國舊俗政策的殖民地政府挑戰。從早年的反蓄婢運動、

11 諷刺的是有關批判還得靠西方學者的自省來啟發。見M. Jaschok, "On Colonies, Colonials, and the Colonized: Contextualizing Women's Studies in Hong Kong," in F. M. Cheung ed., *Engendering Hong Kong Society: A Gender Perspective of Women's Stud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1-360.

上世紀六、七〇年代的反納妾運動、到九〇年代末新界繼承權的抗爭，以至婦女運動本土化的發展，都有待深入探究。關鍵的課題包括殖民主義與華人父權文化的關係、傳統權威和社會經濟勢力的結合、性別身分與市民身分問題等。已出版的概述性文章，還需大量事實的補充和理論的建構（張彩雲，1992；陳錦華，2001；陳順馨，2005；蔡寶瓊，1997；P.K. Choi, 1997；G.Y. Tsang, 1995；C. Lee, 1997）。

及至 2000 年，黃碧雲以香港殖民地時代的婦女運動為題，發表其政治學博士論文，總結香港自 19 世紀中到 1997 年間的婦運史，審視廢除妹仔制、妾侍制、爭取新界婦女繼承權、平等機會立法等四項法制改革的過程及其成效。分析政治和社會結構、民主化程度及婦女團體與反對力量間的角力等三大因素的影響。作者以其身為民主派人士的政治觸覺，特重香港民主化與婦運的關係，認為中國文化及傳統習慣、殖民主義、政府與資本家的關係以及婦女運動本身，皆為重要的相關因素。最後的總結指出，香港政府對婦女問題回應消極，乃因香港在八〇年代前民主不彰之故。論文也將香港與新加坡相比，以突顯香港在中國傳統習慣、殖民主義和性別政治間關係的複雜性和特殊性。研究雖採政治學進路，但已是目前對香港婦運交代最詳盡的作品。除政治、社會結構和婦女團體能動性的分析外，也關注時代背景的影響，故其歷史性不弱（H.P. Wong, 2000）。

（三）性別、階級及種族的後殖民反思

正如討論香港婦女運動的學者指出，八〇年代是運動的轉型期，本土化和為革除殖民地時期殘留的父權傳統而發起的社會行動，都有加速發展的政治化傾向。這種趨勢理應刺激學界的後殖民反思工作，然而，有關努力仍不多。在婦女史的研究上，相關的反省本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殖民主義作雙管齊下的性別觀照，並對本土婦女的處境和經驗作更深層的歷史考察。¹² 這個方案對近代中國婦女史和香港婦女史的研究當有

12 如以下書文所論課題的歷史背景就值得深究：E.W.Y. Lee ed., *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archy* (Hong Kong:

一定意義。可惜這方面的計劃仍有待開展。以下是個人對有關課題的一些構想。

如前所述，本人在九〇年代開展的一項華南婦女研究發現，婦女文化與地方社會文化密不可分，故婦女史應與性別史並重。近來我在整理本土婦女史料時，發現我們不僅可以婦女史來豐富性別史的內容，還可進一步尋繹性別與階級、種族或其他社會關係互動的複雜現象。就以妹仔問題為例，由於她們不僅是無聲的一群，而且早已逝去，無法追尋其訊息。Jaschok 要研究華人蓄婢習俗，就只得接觸一些婢女的後人，作「跨代」式訪問而已。不過，在 19 世紀七〇至八〇年代間，香港華人社會領袖與英國殖民者間，曾有一場對華人蓄婢制的所謂妹仔問題的爭議，論辯雙方在保護婦女問題上留下了大量文獻。對這些論述作出分析，我們起碼可瞭解當時男性社會領袖對邊緣婦女的看法。故大量的男性論述是不可多得的性別史資料。不寧唯是，對這批華洋男性精英分子的話語作出分析，我們更可瞭解性別與階級和種族的複雜關係。

從這些論述的分析可見，殖民者「以華治華」和「分而治之」的治術背後，是一套強調中西文化截然不同，東西各處於兩個迥異世界，中國人的「不文明」特性不宜觸動，也難以改變的「東方主義」。弔詭的是，華人精英和殖民者都強調東西文化的差異和各自的合理性，而在這個共通的論述基礎上達成對妹仔問題的共識。這些具有共通性的論述，是中西雙方都以對方為「他者」而建立的。這種語言技巧把一些曾引起爭議的現象合理化了，如曾被稱為奴隸制的妹仔制竟成了慈善制度。指出其對貧苦女孩有救濟作用，也就同時掩蓋了階級、性別、種族等矛盾，以及奴役性質等尖銳問題。現狀的維持當然令華人精英和殖民地政府各得其利，但代價卻是真正有效的保護婦女措施。如果拐賣婦孺和逼良為娼問題的真正根源，在於婦女人口販運和妹仔制度，不根除這些問題，任何保護婦女的方式都是注定無效的。故殖民地政府和香港華人精英在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C. Jones, "The New Territories Inheritance Law: Colonization and the Elites," in V. Pearson and B.K.P. Leung eds., *Wom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7-192.

19 世紀八〇年代達成的妥協，只能暫時維持現狀。難怪在 20 世紀最初十年內，環繞妹仔問題的議論再起，並發展成牽涉多方的論爭高潮。¹³

這個研究案例一方面可以充實後殖民研究，在這方面，不少人引用 E. Said 所指出的西方殖民者視東方為他者的東方主義論 (E. Said, 1978)。但亦有批評者質疑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截然對立的看法 (E. Locher-Scholten, 2000 : 26-27 ; H.K. Bhabha, 1990、1994 ; G.C. Spivak, 1990、1999 ; R. Mohanram, 1999)。也有人強調殖民族主義的內容常因殖民地內部的變化而有所更張，殖民政策也並非單由宗主國擬定，在其實踐過程中，殖民地官員與當地本土社會人士間的談判，以及殖民者內部的協議等複雜因素，往往發揮一定的影響作用 (J. Clancy-Smith and F. Gouda, 1998 : 4-5)。在殖民地社會中，除種族外，階級和性別等問題也令情況複雜化。Said 對被殖民者的主動性似乎注意不足，他也忽略了殖民主義論述中的性別意涵，故他所稱的「東方他者」可說只是一個階級模糊的男性而已，應可進一步接受性別和階級的解構 (E. Locher-Scholten, 2000 : 26)。

這個對 19 世紀末香港妹仔問題的初步研究，實已涉及種族、階級和性別等方面，因有關問題關乎殖民地國家統治下，華人父權社會中的下層婦女的命運。由於這些婦女是沉默的被保護者，重視婦女主體的婦女史範式對這案例或難完全發揮解釋力，但性別史的進路正可補救這種不足。對男性論述的分析所得也顯示動性較強、脈絡較寬的性別史在方法上的多樣性。如果性別可視為表示權力關係的方式，而權力關係與論述的構成息息相關，對論述作語言和意義的解釋，便可瞭解有關權力知識系統如何形成。交代有關性別、階級和種族的論述和文本的社會文化背景，也就是探討這些訊息和觀念在什麼歷史情景或社會結構安排下產生。

然而，作為性別史的一種方法，論述分析始終無法取代婦女史所重視的發掘婦女聲音的研究進路。何況，婦女聲音正是解構男性論述的重

13 20 世紀後的問題有待詳析，有關論爭的起源及其語境，見 H.M. Yip, "Chinese Society, Colonial State: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Early British Hong Kong," 收入 F. Lui ed., *Voices and Silence (1): Women and the Nation in Modern China (1600-1950)* (Taiwan: Academia Sinica, 2003), pp. 223-255.

要依據。追尋婦女主體性的努力與後結構主義的論述分析法和再現法之間的張力，已備受爭議。倘資料充足，婦女史與性別史的結合當為出路。例如，本人對19世紀末，香港華人社會領袖與英國殖民者之間的一場有關華人蓄婢制的論爭的分析，充其量只是一個中程的研究而已。由於保良局檔案中有豐富的婦女口供，是一個有待開發的寶藏，可用以對照男性論述，以收解構之效，並補話語分析法只重男聲的偏頗。有關發現無論對主流歷史或後現代史學都具無窮挑戰潛力。

(四) 小結：後殖民時代的研究契機

香港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經歷了從中國史和香港史中尋找婦女、把歷史還給婦女、以至婦女史與性別史並重及對性別、階級和種族作後殖民反思的歷程。早年在文化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影響下，文化史和社會史的成果較豐，涉及家族、族群、風俗、文化交流等課題。目前除婦女運動史的研究還須深化外，婦女的身體和性、婦女與教育、工作、法制、宗教¹⁴等都是尚待開展的領域。近年除中國近代政治史和人物研究外，關注點也包括文化史與社會史互動在方法學和本土理論建構上的啓示。香港婦女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中所浮現的具有族群和階級基礎的多重主體性，可以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有所補充。後者相對而言是較傾向於「大傳統」的。另一方面，在婦女足跡不外顯的領域，便得靠性別觀照法了。無論對中國的父權文化或現代性（包括民族主義或殖民主義的現代性）（及其後現代批判），婦女史研究者都可從性別角度作出分析或解構，再配合其他範疇如階級、族群等的研究成果，總結出複雜的本土特性。

兼採婦女史和性別史進路的本土研究顯示，西方的兩性對立觀和永恆分叉論用以說明中國現象顯然過於簡化。對性別、階級及種族所作的後殖民反思，也指出西方後殖民理論中所曾忽視的性別和階級維度。今

14 如在婦女與基督教等重要課題，有關研究極少，例見黃慧貞，〈參雜的祝福：基督教與早期香港婦女〉，收入魏國英、王春梅主編，《中國文化與女性》（香港：萬海語言出版社，2003），頁264-272；黃玉梅，《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歷史，1920-1988》（香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1988）。

後仍須繼續發掘、爬梳本地豐富的婦女口供紀錄和口述傳統，以加強婦女史對性別史的啓發，以及為階級、族群等關係的研究作出貢獻。

四、 婦女、性別及其他（代結語）

的確，任何讓原本無聲者發聲或原本無史者訴說自身生命史的研究計劃，都肯定有挑戰性的效果，姑勿論他們所說的有多大程度真是他們的聲音。問題是，歷史上總有一些無法發聲的人，他們反而是大多數，婦女又是這大多數中的大多數。人民史無論怎樣偉大，都無法讓他們說話。要處理這個婦女史研究上的絕大難題，就得求助於性別史。由於歷史上不少婦女問題主要都是男人提出的，他們常充當女性的保護者和代言人，他們對婦女問題的看法及其意涵該是性別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不過，正如杜芳琴所說，我們要時刻不忘婦女始終是我們的關注重點，應竭盡所能，窮盡一切呈現她們的主體性（無論多複雜）和能動性，並可用以解構男性論述的史料。例如，保良局的口供檔，或自梳女的口述，都可讓我們對香港的保護婦女政策或華南婦女文化的研究兼採婦女史和性別史的進路。

今天，性別史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發展可說方興未艾，兩地的交流應可使我們同時警惕到民族主義和東方主義的陷阱。可預見的是，社會性別的概念將刺激大陸學者對中國民族主義現代性的反思，後殖民理論則可繼續用以分析香港殖民主義現代性與中國傳統父權文化間的互動，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也將推動現代性的解構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人類的社會關係體系中既包含性別的等級關係，也包含這種關係與其他等級關係的聯繫，故致力於性別概念建構的學者也指出，分析性別關係的框架也適用於族群、階級等關於人類社會權力結構的課題。認真審視這類主題，作細緻考察，將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更全面，且對有關理論概括的檢驗工作有所裨益。在這方面，杜芳琴在引進社會性別觀念時也不斷強調：

……婦女社會性別史的研究不但將社會性別作為重要的觀察

和分析範疇，而且也要將人存在的多重維度和身分結合起來分析，如階級的、種族的、民族的、年齡的各種元素交 綜合分析……（杜芳琴，2002：208）。

她又指出：

……婦女史也應該將「社會性別」的範疇引入，不單純是研究歷史中的婦女，而是關注性別的狀況關係和這種關係相關的其他各種關係，包括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心理的、生理的各種與性別的有關範疇和關係，這些都應該成為婦女史的議題（杜芳琴，2002：176）。

她認為社會性別制度的複雜性「不僅表現在時代、民族、地域、城鄉的差別，也反映在橫向共時的階級、性別、年輩的錯綜交叉的複雜關係上。」這種複雜性可稱為「多重等級的交織」（杜芳琴，2002：195）。我們對婦女／性別史作本土探索，其實就是在中國或華人社會的具體時空中，審視性別與其他社會關係交織的複雜性，這也就是「賦性別以歷史意義」的工作。

尋找近代中國史和香港史中的婦女（尤其是平民婦女），實在困難重重，中國大陸的婦女史家得兼採新社會史中的人民史研究法；香港則須借助其文化史和人類學研究傳統。從婦女生活和社群中聽取她們的聲音，也會對女性主義理論造成挑戰，因這些理論往往用自以為具普遍性的西方理想涵蓋非西方婦女。駐港的西方學者已較早地提出要在女性主義研究上作批判式自我反省，主張在香港史的脈絡中，認識本地女性的複雜主體性。在這方面，文化史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裨助至大。她們認為女性主義理論的重構，端賴對性別和文化歧異性的承認，並以非西方婦女為自決、自主的歷史主體，以重建多種社會中的婦女史。

參與這些理論重建工作的學者，將揭示香港婦女史中研究不足的部分。例如，在殖民主義與父權制間的關係，如何影響後殖民地時代中，持續存在的殖民主義傳統（或各種再殖民、新殖民主義）與父權文化的結合。因這兩者與資本主義共存，也必為各種形式的保守力量所保護、培育，以追求後殖民地時代的霸權。在敘述多元文化環境中的香港歷史，

以及香港為界定自己身分而作的「後殖民自我書寫」(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時 (R. Chow, 1992)，具批判力的研究者，應嘗試考究婦女的敘述如何反映出一個體現多重主體位置、多重身分認同、多重關係交織的複合體的特性，以及這種複雜性在我們的研究中為何受到忽視。

有了這種自省能力，香港婦女研究或其他學術領域，便不必只為西方理論做注釋工作。事實上，女性研究者與作為研究對象的本地婦女，可以在研究過程中互相溝通，為取得理論突破而合作。可以清楚肯定的是，在後殖民時期抗擱東方主義與普遍主義霸權結構和意識型態的學術和社會著述，當以本地婦女的認知及身分認同為研究的主題。

這種學術趨勢能否為香港後殖民時代帶來豐碩的研究成果，還要拭目以待。同樣，主導中國革命和婦女運動的反殖、反帝民族主義，在接受女性主義和社會性別觀解構時，中國婦女史研究者也宜以其文化直覺，發掘本土婦女的多重身分認同和複雜主體性。李小江就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他者』」的危機感，歷史正如一道最後的防線，因為對她來說：

……「歷史」其實恰恰是最不能被殖民的，無論今後「全球一體化」到何等程度，歷史的解釋都不能不是本土的，因為它不僅是我們與外界交流的資本，更是我們存在的依據 (李小江，2002：5)。

從歷史看，我們的身分認同不僅是多重的，也是多變的，各種認同在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的優次序列。故我們得問：甚麼條件令性別、種族或階級的認同，在某歷史時期中變得突出，而在另一時期中並非如此？甚麼因素令某歷史階段中的民族矛盾比階級矛盾嚴重，或階級不平等比性別不平等更受關注呢 (葉漢明，2001)？中國和其他華人社會的多元複雜性和歷史演變，實深具挑戰先驗宏觀理論的潛力，需要我們發揮史家的本色，發掘、窮盡史料，作嚴謹、扎實的研究。¹⁵ 婦女／性別史研究

15 例如，有利研究的基礎建設工作實刻不容緩。就以女權的話語分析為例，若「女權」一詞在中國如何出現的問題仍懸而未決，有關討論便難以開展。[見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

者對性別理論的貢獻，也在於我們能否「賦性別關係以歷史性」。我們關注婦女，也關注性別，還得關注其他，更關注我們的歷史。這正是婦女／性別史研究近年來對史學的啓示，也是中國婦女史研究對中國和世界史壇所應發揮的作用。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7-57。] 利用新研究工具，我們現在起碼知道該詞早在 1899 年 10 月的《清議報》上出現過。[據《梁啟超系報刊檢索系統》，<http://lqcjournals.chi.cuhk.edu.hk>（蔣英豪、鄧仕樑，「現代漢語詞匯的創世紀——梁啟超系報刊新語詞研究」，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1999-2002）。]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丁衛平，《中國婦女抗戰史研究 (1937-1945)》。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水鏡君、瑪利亞·雅紹克，《中國清真女寺史》。北京：三聯書店，2002。
- 王子今，《中國婦女從軍史》。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8。
- 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王紹璽，《小妾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
- 王國敏等，《20世紀的中國婦女》。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
- 王慶淑，《中國傳統習俗中的性別歧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 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從「一二·九」運動看女性的人生價值》。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
- 全國婦聯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 呂美頤，《走出中世紀：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的變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呂美頤、鄭永福，《近代中國婦女生活》。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呂美頤、鄭永福，《近代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李小江編，《婦女研究運動：中國個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 李小江等，《歷史、史學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文化尋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a。
-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b。

-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民族敘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c。
-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自己說話：獨立的歷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d。
- 李少兵，《民國時期的西式風俗文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李永等，《何香凝傳》。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
- 李永集，《性別與文化：客家婦女研究的新視野》。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李靜之，《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 杜芳琴，《女性觀念的衍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杜芳琴，《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杜芳琴，《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視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杜芳琴、王向賢編，《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杜芳琴、王政編，《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杜芳琴、和鍾華主編，《大山的女兒：經驗、心聲和需求》（華北卷、西南卷）。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8。
- 汪玢玲著，《中國婚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佟新，《異化與抗爭：中國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和鍾華，《生存和文化的選擇：摩梭母系制及其現代變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
- 定宜莊，《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a。
- 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b。
- 武舟，《中國妓女生活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

- 青長蓉等，《中國婦女運動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
- 尙明軒，《何香凝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姜緯堂、劉寧元主編，《北京婦女報刊考》。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
- 姜躍濱，《中國妻妾》。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施永南，《納妾縱橫談》。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8。
- 計榮主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
- 香港新婦女協進會，《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8。
- 陸德陽、王乃寧，《中國近代的女傭》。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孫石月，《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
- 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孫曉，《中國婚姻小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 陶毅、明欣，《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
- 祝瑞開主編，《中國婚姻家庭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 馬庚存，《中國近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
- 馬維綱編，《禁娼禁毒：建國初期的歷史回顧》。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 高洪興著，《纏足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
- 張允熠，《陰陽聚裂論》。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8。
- 張彩雲編，《另一半天空：戰後香港婦女運動》。香港：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2。
- 張曉，《江西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 張樹棟、李秀領，《中國婚姻家庭的嬗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陳順馨等編，《「情動、運動——香港婦女運動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文集》。
香港：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5。
- 陳錦華等合編，《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香港：香港新婦

- 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2001。
- 陳鵬，《中國婚姻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0。
- 閔家胤主編，《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黃玉梅，《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歷史，1920-1988》。香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1988。
- 黃新憲，《中國近現代女子教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黃嫣梨，《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香港：香港亞洲研究中心，1997。
- 楊潔曾、賀宛男編著，《上海娼妓改造史話》。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
- 郭錦桴，《中國女性禁忌》。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葉漢明，《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2。
- 葉漢明，《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 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
- 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廣東婦女運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 蔡鴻生，《尼姑譚》。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
- 蔡寶瓊統籌，《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1998。
-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嚴昌洪，《西俗東漸記——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變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 閔廣芬，《中國女子與女子教育》。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
- 蘇平，《蔡暢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
- 蘇智良等，《慰安婦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 蘇智良，《日軍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a。

蘇智良等主編，《滔天罪孽 —— 二戰時期的日本「慰安婦」制度》。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b。

蘇智良等，《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譚琳、劉伯紅主編，《中國婦女研究十年（1995-2005）：回應《北京行動綱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Bhabha, H.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Bhabha, H.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Duara, P.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Hoe, S.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Expatriate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Hoe, S. *Chinese Footprints: Exploring Women's History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Hong Kong: Roundhouse Publications (Asia) Ltd., 1996.

Lee, E.W.Y. ed. *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arc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Lee, L.X.H. and Stefanowska, A. 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8.

Locher-Scholten, E. *Women and the Colonial State: Essays on Gender and Modernity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1900-1942*.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Mohanram, R. *Black Body: Women, Colonialism, and Spac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Said, E.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Sinn, E.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mith, C.T. *Chinese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pivak, G.C.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Spivak, G.C. *The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am, S.M. and Yip, H.M. eds. *Tung Chung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Airport: An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2005.

Watson, R.S. *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 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二、論文

- 丁和平，〈清末民國潮汕女學述往〉，《嶺南文史》，期2，1995，頁42-46。
- 丁衛平，〈淪陷區婦女的抗日鬥爭〉，《吉林大學學報》，期4，1999，頁90-95。
- 小田，〈江南鄉村婦女職業結構的近代變動〉，《歷史檔案》，期3，2001，頁107-113。
- 水世琿，〈雷潔瓊在抗日戰期間的崢嶸歲月〉，《團結報》，1992年6月17日，7月1日，8月11日。
- 王奇生，〈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的歷史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期2，1996，頁59-66。
- 王如青，〈「階級的解放」和「個體的覺醒」——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兩種婦女觀芻議〉，《河北大學學報》，期5，2000，頁138-141。
- 王美秀，〈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北京大學學報》，期4，1995，頁105-111。
- 王秀美，〈中國近代社會轉型與女子教育的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3，2001，頁87-94。
- 王玲玲，〈西安事變與婦女解放運動〉，《人文雜誌》，期6，1999，頁153-155。
- 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9編：民初政治(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677-709。

- 王海華，〈侵華日軍性暴力對中國女性的摧殘 —— 抗戰時期山西孟縣日軍性暴力受害者調查〉，《婦女研究論叢》，期 2，1999，頁 37-40。
- 王麗，〈近代廣東女性獨身現象：自梳和不落夫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期 3，2001，頁 50-54。
- 王巖，〈太平天國婦女的法律地位淺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4，1998，頁 90-95。
- 石巧蘭、李興芝，〈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我國的早期傳播及其中國化〉，《婦女研究論叢》，期 1，1992，頁 33-36。
- 朱敏彥，〈近年來宋美齡研究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6，1992，頁 72-78。
- 江沛，〈20 世上半葉天津娼業結構論述〉，《近代史研究》，期 2，2003，頁 153-186。
- 池子華，〈近代歷史上的「打工妹」〉，《北京日報》，2000 年 1 月 17 日。
- 行龍，〈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近代史研究》，期 3，1991，頁 168-183。
- 何黎萍，〈論中國近代女權思想的形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期 3，1997，頁 84-90。
- 何黎萍，〈試論近代中國婦女爭取職業及職業平等權的鬥爭歷程〉，《近代史研究》，期 2，1998a，頁 212-226。
- 何黎萍，〈中國婦女爭取財產權和繼承權的鬥爭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期 4，1998b，頁 49-55。
- 何黎萍，〈中國近代婦女教育平等權的演進〉，《社會科學輯刊》，期 6，2000，頁 108-113。
- 何黎萍，〈抗戰以前國統區婦女職業狀況研究〉，《文史哲》，期 6，2002，頁 163-168。
- 何黎萍，〈解放戰爭時期婦女職業狀況考察〉，《史學月刊》，期 1，2003，頁 107-112。
- 何鵠至，〈告警予早期思想初探〉，《求索》，期 4，1987，頁 87-92。
- 吳洪成，〈中國近代教會女學論述〉，《西南師範大學學報》，期 1，1997，頁 66-71。
- 吳強，〈婦女解放的第一步 —— 辛亥革命以後的解放婦女纏足運動〉，《雲南檔案》，期 4，1995，頁 41-42。

- 吳淑珍，〈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歷史考察〉，《中山大學學報》，期 2，1990，頁 77-84。
- 吳鳳儀，〈婚姻的再詮釋：廣東順德自梳與不落家之女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1996 年。
- 邢鐵，〈二十世紀國內家庭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期 4，2003，頁 16-21。
- 呂美頤，〈中國近代女子服飾的變遷〉，《史學月刊》，期 6，1994a，頁 47-53。
- 呂美頤，〈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婦女中的傳播及其影響〉，收入李小江等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b，頁 230-251。
- 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於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期 5，1995，頁 73-99。
- 呂美頤，〈論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對社會變遷的推動作用〉，《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4，1999，頁 5-11。
- 呂美頤、鄭永福，〈20 世紀 20、30 年代女性職業簡論：從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建立談起〉，《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6，2002，頁 129-133。
- 宋瑞芝，〈近代婦女教育的興起與婦女的覺醒〉，《河北學刊》，期 5，1995，頁 91-94。
- 李子雲、陳惠芬，〈誰決定了時代美女？——關於百年中國女性形象之變遷〉，《中國文化研究》，期 3，2001，頁 131-137。
- 李小江，〈婦女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及前景〉，收入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頁 1-20。
- 李小江，〈兩種資源，雙重困境〉，收入李小江等，《歷史、史學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 42-47。
- 李本義，〈辛亥革命與五四時期婦女解放運動比較研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6，1998，頁 67-71。
- 李永春，〈論近代中國教會好教育〉，《湘潭大學學報》，期 7，1997，頁 46-48。

- 李年終，〈20年代湖南女工問題研究〉，《山東社會科學》，期1，2002，頁102-104。
- 李媛，〈宋美齡與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婦女界統一戰線〉，《黨史研究與教學》，期2，1993，頁52-60。
- 李鳳飛、暴鴻昌，〈中國婦女纏足與反纏足的歷史考察〉，《學習與探索》，期3，1997，頁119-126。
- 李衛平，〈向警予論婦女運動統一戰線〉，《求索》，期5，1985，頁83-86。
- 李銀河，〈關於性別史的思考〉，《史學理論研究》，期3，2004，頁13-17。
- 李德珠，〈「中國人」、「人」和「女人」——從社會性別視角審視劉清揚的三重身份〉，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72-186。
- 沈智，〈辛亥革命時期的女知識分子〉，收入《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358-377。
- 汪丹，〈五四時期婦女解放觀的幾個層面〉，《天津師範大學學報》，期2，1999，頁45-50。
- 江沛，〈20世上半葉天津娼業結構論述〉，《近代史研究》，期2，2003，頁153-186。
- 忻平，〈民國時期上海的職業婦女〉，《民國春秋》，期3，1990，頁34-35。
- 忻平，〈20-30年代上海青樓業興盛的特點及原因〉，《史學月刊》，期1，1998，頁96-100、109。
- 杜芳琴，〈婦女／社會性別史對史學的挑戰與貢獻〉，《史學理論研究》，期3，2004，頁4-8。
- 杜芳琴，〈中國婦女史：從研究走向學科化〉，《山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3，2002，頁88-95。
- 杜芳琴、蔡一平，〈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陝西大學師範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2，1999，頁154-160。
- 周一川，〈清末留日學生中的女性〉，《歷史研究》，期6，1989，頁49-64。
- 周亞平，〈中國婦女參政的歷史軌迹〉，《吉首大學學報》，期2，1992，頁74-78。
- 周亞平，〈論辛亥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歷史檔案》，期2，1993，頁118-123、

125。

周亞平，〈抗日戰爭與中國婦女的新覺醒〉，《湖南師範大學學報》，期5，1995，頁50-53。

周昭宜，〈近代女子報刊的興起及意義〉，《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期1，1997，頁109-112。

孟新安，〈中國近代男女平等思想芻論〉，《江漢論壇》，期12，1994，頁44-48。

尚明軒，〈宋慶齡與抗戰時期的婦女運動〉，《抗日戰爭研究》，期4，1995，頁80-89。

林吉玲，〈近代女子教育觀念的更新及其實踐〉，《學術論壇》，期3，2001，頁94-97。

林紅，〈廢娼與婦女解放的歷史反思〉，《婦女研究論叢》，期2，1997，頁38-42。

林庭芳，〈論南方局「婦委」領導國統區婦女統戰工作的歷史經驗〉，《攀登》，期4，1991，頁26-31。

武錦蓮，〈抗戰期間的婦指會及其活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期2，1989，頁128-130、115。

邵雍，〈二三十年代中國女性匪幫的婚姻家庭概觀〉，《檔案史料與研究》，期4，1999，頁79-82。

金帆，〈略談客家的民間文學〉，收入中華會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方言文學研究會編，《方言文學》。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頁71-85。

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飾改革述論〉，《史學月刊》，期6，1994，頁31、54-58。

岳瓏，〈近代陝北女子早婚與生育健康〉，《人文雜誌》，期4，1999，頁120-123。

侯杰、秦方，〈男女性別的雙重變奏：以陳櫻寧和呂碧城為例〉，《山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3，2003，頁118-122。

侯杰，〈男權秩序下的新女性之死——張嗣婧研究〉，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45-157。

侯德楚，〈宋氏姊妹與「工合」運動〉，《文史雜誌》，期4，1995，頁44-45。

姜海龍，〈「革命者形象」下的女權主義者郭隆真〉，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

- 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58-171。
- 姜濤，〈中國近代婚姻與家庭結構〉，《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學報》，期 4，1994，頁 20-28。
- 施宜圓，〈留日女學生與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檔案與史學》，期 3，1997，頁 63-65。
- 胡衛青，〈上海中西女塾簡論〉，《韓山師範學院學報》，期 1，2002，頁 10-21。
- 夏蓉，〈宋美齡與抗戰初期廬山婦女談話會〉，《民國檔案》，期 1，2004 年。
- 夏曉虹，〈從男女平等到女權意識 —— 晚清的婦女思潮〉，《北京大學學報》，期 4，1995，頁 97-104。
- 夏曉虹，〈晚清女性：新教育與舊道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3，2003，頁 62-74。
- 秦方，〈生活在男權社會中的奇女子 —— 呂碧城〉，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87-201。
- 孫蘭英，〈論中國近代婦女運動的「男性特色」〉，《史學月刊》，期 3，1996，頁 96-100。
- 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7-57。
- 徐永志，〈近代溺女之風盛行探析〉，《近代史研究》，期 5，1992，頁 30-42。
- 徐永志，〈晚清婚姻與家庭觀念述論〉，《清史研究》，期 2，1999，頁 40-44。
- 徐建生，〈近代中國婚姻家庭變革思潮述論〉，《近代史研究》，期 3，1991，頁 139-167。
- 徐葉麗，〈近年來宋慶齡研究綜述〉，收入宋慶齡基金會辦公室編，《紀念宋慶齡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徐輝琪，〈辛亥革命時期婦女的覺醒與封建禮教的衝擊〉，《近代史研究》，期 4，1994，頁 127-143。
- 徐勝萍，〈五四時期中國婦女地位的變遷〉，《東北師大學報》，期 6，2000，頁 27-30。

- 晁海燕，〈抗戰時期國統區的婦女訓練〉，《西北大學學報》，期4，1997，頁26-29。
- 桑兵，〈近代中國女性史研究散論〉，《近代史研究》，期3，1996，頁259-275。
- 高小賢，〈婦女與發展在中國：對實踐的分析與再認識〉，收入徐午等編，《社會性別分析：貧困與農村發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4-17。
- 高得華，崔薇圃，〈論中國近代女學的產生和發展〉，《齊魯學刊》，期4，1995，頁68-73。
- 傅建成，〈論民國時期華北農村的早婚現象〉，《社會學研究》，期4，1994，頁110-116。
- 崔運武，〈近代中國教會女子教育淺釋〉，《史學月刊》，期2，1988，頁42-47。
- 張百慶，〈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的娼妓問題〉，《史學月刊》，期1，1999，頁99-103。
- 張佩國，〈近代江南農村婦女的「財產權」〉，《史學月刊》，期1，2002，頁113-120。
- 張海梅，〈論五四前後的女子教育〉，《歷史檔案》，期2，2001，頁101-106。
- 張偉，〈近代上海離婚狀況比較〉，《社會科學》，期12，2000，頁63-67。
- 張敏，〈試論晚清上海服飾風尚與社會變遷〉，《史林》，期1，1999，頁47-56。
- 張蓮波，〈二十世紀初的婦女團體〉，《史學月刊》，期2，1991，頁48-53。
- 張蓮波，〈民國初年的婦女參政〉，《史學月刊》，期2，1988，頁48-53。
- 張蓮波、周麗亞，〈1922年前後中國婦女參政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及爭論〉，《中州學刊》，期5，1998，頁131-134。
- 張曉麗，〈《新青年》的女權思想及其影響〉，《史學月刊》，期4，1996，頁110-112。
- 張麗艷，〈民國時期的女子警察〉，《民國春秋》，期6，2001，頁11、20-22。
- 張顯菊，〈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刊物的婦女解放思想宣傳〉，《史學集刊》，期3，1995，頁26-31。
- 扈光民，〈五四婦女運動的特點〉，《山東師範大學學報》，期3，1990，頁44-47。
- 曹玄思，〈先天道安老院之自梳女〉，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
- 曹玄思，〈先天道的自梳女〉，收入馬建釗等編，《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

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5，頁 124-140。

梁怡，〈延安女子大學評價〉，《抗日戰爭研究》，期 2，1999，頁 91-104。

梁景和，〈近代中國女學演變的歷史考察〉，《遼寧師範大學學報》，期 6，1993，頁 75-79。

梁景和，〈五四時期「生育節制」思潮述略〉，《史學月刊》，期 3，1996，頁 49-53、68。

梁景和，〈五四時期的「男女社交公開」思潮〉，《史學月刊》，期 1，1998，頁 51-56、64。

梁景和，〈近代中國女性陋俗文化嬗變述論〉，《中國文化研究》，1999 年秋之卷，頁 95-101。

梁景和，〈五四時期「性教育」思潮〉，《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6，2000，頁 89-93。

梁景和、梁景時，〈近代女性陋俗觀的改變〉，《江漢論壇》，期 9，1994，頁 39-43。

梁景時，〈中國近代不纏足運動始末〉，《山西師大學報》，期 1，1995，頁 64-70。

梁景時，〈清末民初婚俗的演變述論〉，《山西師大學報》，期 1，1999，頁 70-73。

梁義群，〈洪宣嬌的來歷及事迹辨〉，《學術研究》，期 1，1998，頁 71-76。

盛永華，〈宋慶齡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收入《宋慶齡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240-281。

郭秀文，〈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思潮〉，《學術研究》，期 6，1999，頁 55-60。

郭金梅，〈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理論的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期 5，1999，頁 101-104。

郭常英、蘇小環，〈近代中國女子留學探析〉，《史學月刊》，期 3，1991，頁 56-63。

郭衛東，〈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教育〉，《歷史檔案》，期 4，2001，頁 98-104。

陳信瓊，〈試論五四運動與安徽婦女解放運動的關係〉，《安徽史學》，期 2，2002，頁 64-66、72。

陳振江，〈清末民初婚姻家庭變革運動的趨向〉，《南開學報》，期 4，1997，頁 32-36。

- 陳笑迎，〈論中國近代「興女學」思潮〉，《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6，2001，頁14-17。
- 陳建維，〈女性的崛起與吶喊——「五四」女性作家群的崛起和她們的文學創作〉，《麗水師專學報》，期1，2000，頁35-38。
- 陳蘊茜、葉青，〈論民國時期城市婚姻的變遷〉，《近代史研究》，期6，1998。頁146-160。
- 麥靈芝，〈宋慶齡——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收入《紀念宋慶齡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66-75。
- 程郁，〈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變遷〉，《史林》，期2002，頁74-83。
- 程郁，〈近代男性知識分子女權思想的產生及其矛盾——以梁啟超為典型案例〉，《中華女子學院學報》，卷16期2，2004年，頁57-62。
- 程紹珍，〈宋慶齡民主革命的婦女解放思想〉，《鄭州大學學報》，期5，1991，頁80-84。
- 黃育馥，〈京劇——觀察中國女性地位變化的窗口(1790-1937)〉，《婦女研究論叢》，期3，1995，頁30-34。
- 黃新憲，〈進步知識婦女群體的崛起與近代社會變革〉，《福建論壇》，期6，1990，頁49-54。
- 黃慧貞，〈參雜的祝福：基督教與早期香港婦女〉，收入魏國英、王春梅主編，《中國文化與女性》。香港：萬海語言出版社，2003，頁264-272。
- 楊念群，〈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收入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1-50。
- 楊秀珠，〈近代中國的平民婦女教育：一個生命歷程史的探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教育)碩士論文，1989年。
- 楊祥銀，〈婦女史、口述歷史與女性主義視角〉，《浙江學刊》，期3，2004，頁210-214。
- 楊潔，〈透視上海近現代女子教育〉，《婦女研究論叢》，期5，2001，頁47-50、64。

- 楊曉，〈中國傳統女學的終結與近代女子教育的興起 —— 戊戌變法時期女學思想探究〉，《學術研究》，期 5，1995，頁 78-82。
- 楊興梅，〈南京國民政府禁止婦女纏足的努力及其成效〉，《歷史研究》，期 3，1998，頁 113-127。
- 楊興梅，〈觀念與社會：女子小腳的美醜與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近代史研究》，期 4，2000a，頁 53-86。
- 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運動努力略述〉，《歷史研究》，期 6，2000b，頁 80-95。
- 焦潤明，〈論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思想〉，《社會科學輯刊》，期 5，1995，頁 118-125。
- 經盛鴻，〈民初女權運動述略〉，《江海學刊》，期 5，1989，頁 134-139。
- 經盛鴻，〈民初女權運動概述〉，《民國春秋》，期 3，1995，頁 3-7, 44。
- 裔昭印，〈婦女史對歷史學的貢獻〉，《史學理論研究》，期 3，2004，頁 8-10。
- 葉孟魁，〈中共最早關於婦女運動的文獻〉，《北京黨史研究》，期 1，1997，頁 72-74。
- 葉春生，〈珠三角的「自梳女」〉，《西江大學學報》，期 4，2000，頁 67-70。
- 葉漢明，〈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新史學》，卷 2，期 4，1991，頁 117-154。
- 葉漢明，〈女性主義史學與中國婦女社會史：當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婦女史學的展望〉，收入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的探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a，頁 97-149。
- 葉漢明，〈權力的次文化資源：自梳女與婢妹群體〉，收入馬建釗等編，《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5b，頁 70-96。
- 葉漢明，〈保良局檔案與香港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6，1998，頁 205-212。
- 葉漢明，〈地方傳統的復歸與再造：均安的關帝崇拜〉，收入劉述先、梁元生編，《文化傳統的延續與轉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a，頁 127-154。
- 葉漢明，〈妥協與要求：華南特殊婚俗形成假說〉，收入熊秉真、呂妙芬等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 史研究所，1999b，頁 251-284。
- 葉漢明，〈華南家族文化與自梳風習〉，收入李小江等編，《主流與邊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c，頁 86-109。
- 葉漢明，〈中國婦女與政治：海峽兩岸婦女參政反思〉，收入葉漢明，《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d，頁 160-174。
- 葉漢明，〈明代中後期嶺南的地方社會與家族文化〉，《歷史研究》，期 3，2000a，頁 15-30。
- 葉漢明，〈社會史與文化史的互動：華南宗族社會與姊妹群組織的研究實例〉，收入李禹階等編，《區域、社會、文化：「區域社會比較」國際學術研討論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b，頁 71-94。
- 葉漢明，〈立足於歷史學的社會史概念建構與更新〉，《天津社會科學》，期 1，2001，頁 80-82。
- 葉漢明，〈口述史料與婦女研究：從《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婦女 —— 訪問紀錄 ——》說起〉，收入游鑑明編，《傾聽她們的聲音 —— 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159-173。
- 葉漢明，〈慈善活動與殖民主義 —— 香港早期的保良事業〉，收入張學明、梁元生主編，《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5，頁 214-236。
- 董妙玲，〈中國婦女抗日統一戰線組織特點和作用〉，《中州學刊》，期 5，1995，頁 104-107。
- 董春，〈教會在華興辦女學之沿革〉，《樂山師範學院學報》，期 2，2002，頁 87-90。
- 裘邁士，〈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江蘇史學》，期 1，1989。
- 暢引婷，〈論建黨初期黨對婦女運動的領導〉，《青海師範大學學報》，期 1，1992a。
- 暢引婷，〈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婦女運動的特點〉，《山西師範大學學報》，期 3，1992b，頁 87-91。

- 臧建，〈婦女職業角色沖突的歷史回顧 —— 關於「婦女回家的三次論爭」〉，《北京黨史研究》，期 2，1994，頁 20-22。
- 劉小林，〈五四時期婚姻觀念變革的時代特徵〉，《廣西民族學院學報》，期 2，1999，頁 128-131。
- 劉文明，〈社會性別史：學理建構及其開放性〉，《史學理論研究》，期 3，2004，頁 10-13。
- 劉巨才，〈新民主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初探〉，《婦女研究論叢》，期 1，1992，頁 37-42。
- 劉正剛、喬素玲，〈近代中國女性的獨身現象〉，《史學月刊》，期 3，2001，頁 147-149。
- 劉詠聰，〈香港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述評〉，收入周佳榮、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1994，頁 124-147。
- 劉華清，〈試論向警予婦女解放思想體系〉，《中華女子學院學報》，期 1，1997，頁 29-32。
- 劉靜，〈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新成立的婦女組織簡介〉，《婦運史研究資料》，期 3，1985。
- 蔣美華，〈辛亥革命前夕婚姻家庭新觀念〉，《山西大學學報》，期 4，1995，頁 22-27。
- 蔣美華、蔣英華，〈論五四時期女性教育角色的變遷〉，《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2，2001，頁 116-120。
- 蔡寶瓊，〈香港婦女運動：身分建構與矛盾〉，收入文思慧、梁美儀編，《思行交匯點 —— 哲學在香港》。香港：青文書屋，1997，頁 318-359。
- 鄭永福，〈佛教與近代中國女性〉，收入李小江等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 213-229。
- 鄭永福、呂美頤，〈佛教與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女性中影響之比較〉，《佛學研究》，期 5，1996，頁 103-107。
- 鄭永福、呂美頤，〈社會性別制度與史學研究〉，《史學理論研究》，期 3，2004，

頁 17-19。

閻文芬，〈中國女子教會教育的近代化歷程、特點及啓示〉，《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期 2，1996，頁 73-78。

閻廣芬，〈中國近代女子義務教育思想的發展歷程〉，《浙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3，1999，頁 64-71。

閻廣芬，〈簡論西方女學對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影響〉，《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3，2000，頁 13-18。

靜雲，〈孫中山的婦女解放思想及其實踐〉，《近代史研究》，期 2，1987，頁 123-135。

韓新路，〈建國 50 年來宋慶齡研究綜述〉，《中華女子學院學報》，期 1，2002，頁 56-61。

韓廉，〈對戊戌婦女運動局限的歷史審視〉，《婦女研究論叢》，期 1，2001，頁 41-46。

韓廉，〈戊戌婦女運動：中國批判性別本質主義的先驅〉，《婦女研究論叢》，期 5，2003，頁 39-45。

戴東陽，〈試論辛亥時期江浙婦女的政治生活〉，《杭州大學學報》，期 3，1995，頁 8-14。

謝長法，〈清末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期 2，1995，頁 272-279。

羅義俊，〈何香凝和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歷史教學》，期 9，1987，頁 32-34。

嚴昌洪，〈唐群英與民初女子參政運動〉，《貴州社會科學》，期 4，1998，頁 100-105。

饒任坤，〈太平天國婦女問題再探〉，《學術月刊》，期 6，1990，頁 61-66。

蘇智良、陳麗菲，〈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略論〉，《歷史研究》，期 4，1998，頁 89-104。

蘇愛榮，〈宋慶齡研究文獻述評〉，《中國圖書館學報》，期 3，1994，頁 47-53。

蕭國鈞，〈從蛋家歌謠看大澳屯門等地之習俗〉，收入蕭國鈞、蕭國健，《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香港：顯朝書室，1982，頁 79-91。

Choi, P.K. "Women," in P. K. Choi and L.S. Ho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69-400.

- Chow, R.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Diaspora: A Journal Transnational Studies* 2:2, 1992, pp. 159-170.
- Clancy-Smith, J. and Gouda, F. "Introduction," in J. Clancy-Smith and F. Gouda eds., *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p. 4-5
- Gilmartin, C. "Recent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about Women in the P.R.C.," *Republican China* 10:1b, 1984, pp. 57-66.
- Jaschok, M. "On Colonies, Colonials, and the Colonized: Contextualizing Women's Studies in Hong Kong," in F. M. Cheung ed., *Engendering Hong Kong Society: A Gender Perspective of Women's Stud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1-360.
- Jones, C. "The New Territories Inheritance Law: Colonization and the Elites," in V. Pearson and B.K.P. Leung eds., *Wom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67-192.
- Lee, C. "Public Discourses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Emergence of Women as a Collective Actor i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S.W.K. Chiu and T. Lui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7-258.
- Rosen, S.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1, 1987, pp. 5-12.
- Sankar, A. "Sisters and Brothers, Lovers and Enemies: Marriage Resistance in Southern Kwangtung," in E. Blackwood, ed., *The Many Faces of Homosexuality: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Homosexual Behavior*.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6, pp. 69-82.
- Sinn, E. "Chinese Patriarch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in M. Jaschok and S.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1-170.

- Smith, C.T. "Protected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in M. Jaschok and S.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21-237.
- Topley, M. "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M. Wolf and W. Roxan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7-88.
- Tsang, G.Y. "The Women's Movement at the Crossroads," in V. Pearson and B.K.P. Leung eds., *Wom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7-291.
- Ward, B. "Regional Operas and Their Audience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in Davi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61-181.
- Watson, J.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92-324.
- Watson, R.S. "Class Differences and Affinal Relations in South China," *Man* 16, 1981, pp. 593-615.
- Watson, R.S. "Women's Property in Republican China: Rights and Practice," *Republican China* 10:1a, 1984, pp. 1-12.
- Watson, R.S.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3:4, 1986, pp. 619-631.
- Watson, R.S. "Afterword: Marriage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R.S. Watson and P. B. Ebrey eds.,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a, pp. 347-368.
- Watson, R.S. "Wives, Concubines, and Maids: Servitude and Kinship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1900-1940," in R.S. Watson and P.B. Ebrey eds.,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b,

pp. 231-255.

Wong, H.P. "Negotiating Gender: The Women's Movement for Legal Reform in Colonial Hong Kong," PhD Thesis, UCLA, 2000.

Yip, H.M. "Lineage and Sisterhood in South China,"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8, 1996, pp. 43-57.

Yip, H.M. "Wome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Hong Kong," in F.M. Cheung ed., *EnGendering Hong Kong Society: A Gender Perspective of Women's Statu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07-340.

Yip, H.M. "Chinese Society, Colonial State: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Early British Hong Kong," in F. Lui ed., *Voices and Silence (1): Women and the Nation in Modern China (1600-1950)*. Taiwan: Academia Sinica, 2003, pp. 223-255.

Yip, H.M. and Ho, W.Y. "The Houwang Cult and Tung Chung's Communal Cultur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6, 1996, p. 151-184.

Yip, H.M. and Ho, W.Y. "Hau Wong Worship and Socioreligious Activities," in S.M. Tam and H.M. Yip eds., *Tung Chung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Airport: An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2005, pp. 198-237.

三、網路資料

《梁啓超系報刊檢索系統》，<http://lqcjournals.chi.cuhk.edu.hk>。蔣英豪、鄧仕樑，「現代漢語詞匯的創世紀——梁啓超系報刊新語詞研究」，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1999-2002。

Women, Gender, and Others: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during Recent Twenty Years and I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Hon-ming Yip

Abstract

Researchers on women's history in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ave in recent year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inquiries and the reappraisal of Western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While women's history is still in the ascendant, the agenda for research on gender history has also been put forward. Since the 1980s, non-official academic activities have provided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women's movement with some critical space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domain of Party history.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did break a new path to people's history from Party history. I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the most remarkable recent developmen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cerned however is yet to be applied to research practices. In Hong Kong,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ians produced more fruitful products than did oth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gender studies in earlier days, emphasis has long been placed up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Hong Kong's intercultural context is also conducive to critical studies of feminism, modernity/post-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ism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locale. Whether this can bring about breakthroughs is yet to be seen.

Today, researchers on women's history in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ave promoted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pointing out that the Chinese female subjectivity is multifariously constructed, fluid, and complex in China as well as other Chinese societies. They als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interactions among gender, class, race, and other social relation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gender approach may stimulate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modernity in China,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ception will continue to facilitate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colonial modernit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 in Hong Kong. We still have to "historicize gender relations" so as to test the applicability of some grand theories and to further enrich our historical knowledge as well. It is in this way that the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can contribute to the field of history and the paradigm of gender studies.

Key Words: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gender history, class/race/others